



朱健国先生序

“中国右派”研究新突破——序武宜三《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本文 87,624 字，细读约需 230 分钟)

目录

“于、武幸会”与“易、秦新论”

易中天提示华夏有四次君王发动的“反右运动”

“三个可见”展示了秦晖对古今新老右派的独特论证

“中国右派”研究进入“基层右派”实名制

杨朱、庄子、孟子、荀子确立华夏“右派”传统

司马迁理想的孔子“反右”艺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右派”的新定性

邓力群的反右研究

秦晖“右派”新论

“新反右”16 招

“新右派”共生术

于真“右派个案”中的共生趋势

洪湖县委的“消极反右”寓言

“于、武幸会”与“易、秦新论”

说来怪怪，吾土早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史学大国——美国学者也盛赞“中国的政治传说和历史记载非常突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 2 版[内部发行]，P10），但近六十年来神州却极难出版“中国右派通史”、“中国右派实名录”，不能让 20 世纪五十年代的这一“中国特色”以全景资治通鉴。无论是三千年的“王朝循环期”还是一百多年的“自强时期”，华夏多少次盛衰荣枯的历史变迁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政党专政时期”的史学怪象。许多学人极想曲线弥补这一遗憾，于是 2019 年春香港出现了一个动人的“于、武幸会”——

猪年春节前三天（2019 年 2 月 1 日，腊月二十七），一幕令人动容的场景

出现在香港九龙马路上：刚从湖北乘高铁来香港的九十岁老右派于真先生，颤抖着向前伸出青筋坚挺的瘦手……定居香港的七十七岁的“中国右派名录”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武宜三，即以肌肉壮实的大手迎接，四手由远渐近，突然紧握、团圆、合抱；于是四目含笑、湿润、模糊……

于真先生带来一份珍贵的“反右”史料——1957年8月20日，中共武钢干部总支对“武汉钢铁公司干部学校语文教员，挂着共青团员招牌的于真”的“右派”定性大批判：《于真是怎样向我们监察制度进攻的？》——

“武汉钢铁公司干部学校语文教员，挂着共青团员招牌的于真，打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研究’监察工作已半年余。从1956年10月开始，到1957年1月间，就写成了所谓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的‘人民代表监察制度’。这个‘制度’的制定，还有语文教员，民盟盟员周鸿庆和他舅父於润华（民革会员）参加。在他的这个‘制度’写成以后，于真曾洋洋自得的声称：‘我已制订了彻底消灭官僚主义的最好办法，给官僚主义撒下了天罗地网，使官僚主义处处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无可隐蔽。’二月间就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写了‘建议书’，和这个‘制度’一起寄给了刘少奇同志。2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回了信，说已将他们的‘建议’留作参考’。于真接到信后很不满意的说：‘没有具体回答这才是官僚主义！’这时也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一份，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回信说，他寄去的‘建议’及‘制度’均已收到’。他便生气地说：‘这比人大常委官僚主义更严重！’原因就是没马上采纳他的建议，没有‘具体答复’。在此以后，他们便到处推销他们的货色，以周鸿庆民盟盟员的身份寄给罗隆基，以於润华民革身份寄给民革中央，6月间又通过於润华向湖北省政协政法研究组胡忠民介绍，曾约定于6月下旬请于真去做报告，但因故未成。他的‘建议’‘制度’共印20余份，除送往许多机关外，还到处以‘请教’、‘征求意见’的名义给许多教员看，散布毒素。使不少人被他的‘忠于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等好听的名词所迷惑。大鸣大放时期，还寄给《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要求发表……”

对于武宜三来说，这一“于、武幸会”刷新了“大陆右派来港”的新纪录。自从2007年着手编写《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武君几乎每年都要与几个来自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右派分子“相逢一叹话反右”，但是与九十高龄的老右派相见，“验明正身”，补充史料，还是首次。就在无数次这样刷新纪录的“右聚”中，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中的右派姓名与日俱增，史料、图片与时俱进，截止2019年2月1日于真先生来港，“大辞典的条目（即右派分子个案）”已超32,000个（武宜三2019年2月9日微信），“图文总量超过一千万字”。纵然这只有官方（1996年）公布的被纠正的552,877名右派分子的5.4%，离实际的右派总数更远，但这一“林中的响箭”带来“东方的微光”，让人希冀“一个也不能少”的“中国右派全录”终有问世的一天。

面对千万字的巨著《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有人想到，要写好“中国右派通史”和“中国右派全景”，须纵向上溯2,400年前的“墨子批孔子”，横向远考

万里外的欧洲、沙俄、国际共运中的无数“斯大林肃反”悲剧对神州历次“反右运动”之遥控。这就让人从“于、武幸会”想到“易、秦新论”。

“易”者，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两人皆在近年有一部新著力助“中国右派”研究——人们从中看到，中国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消失的国家，皆因中华文化结构中始终保持有“左右平衡”的稳定结构。即使在“王朝循环期”最黑暗的时期，如朱元璋亲自批判孟子和万历皇帝将李卓吾定为“中国第一思想犯”的明朝，朝廷也仍然设有可以公开批评皇帝的“御史”——顺从强制赞誉皇权者为左派，反对强制批评皇权者为右派。“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这种左右共生的文化传统，直到“政党专政时期”才首次受到全面的摧残破坏。1957年的“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既违背中华文化传统，更背离现代文明的“自毁长城”。

所谓“周秦之变”，就是周朝向秦朝的变革。即由封建制变为帝制，由小共同体变为大共同体，由贵族制变为官僚制，由王道变为霸道，由君臣逻辑变为行政化逻辑。结果儒学从约束皇帝变为约束百姓。

而“孙毛之变”，即“王朝循环期”变为“政党专政时期”，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如儒学从约束皇帝变为约束百姓一样，于是只让党老大有自由而让百姓无自由，受宠的奴才逼迫不受宠的附庸“通向奴役之路”——从“引西救儒”走出秦制，变成“引西排儒”追求秦制，“荆轲刺孔子”变成“荆轲颂秦王”。

“大右派”储安平曾一语中的：“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今天则可解读为：国民党是周多秦少，共产党是秦盛周微；国共之争如周秦之争，“孙毛之变”如“周秦之变”。蒋介石对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的收编如同周朝天子与诸侯，毛泽东对一些自治区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君王发动“反右运动”，是“周秦之变”后才可出现的“中国特色”。

易中天提示华夏有四次君王发动的“反右运动”

2016年1月，易中天240万字的巨著《易中天中华史》（20册，已至元代，明清待续）问世。虽然书名有点不太准确，在当代还是堪称一部无出其右的《中华史札记》。尽管其小学功力和注释功夫难望胡三省，但其视界的世界化及经史独悟、国士担当却不让胡三省的《资治通鉴广注》（音注）。所以，《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堪称解释“中国右派”的源头新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就是“左右争鸣”，展现了华夏最早的“左派批右派”和“右派驳左派”。古代以“君权至上”为左，“一毛不拔”和“民为贵”为右。斯时中国四大显学：墨、道、儒、法——墨、法两家以铁腕“尚同”可谓坚定不移的拥君“左派”；儒家以“中庸至上”而亦左亦右：孔儒以“君君臣臣”趋左，孟儒以“君为轻”偏右；道家则老子是以“无为的专制”成左派，杨朱是个人至上疑君蒜甘当右派，庄子可称追求个人自由逍遥隐士的右派。儒、法、道三教互为表里合流影响中国两千年，而墨家则在断代二千多年后，于1949年后借“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看齐”神奇复兴了“尚同”与“强制”。

墨家因“尚同”论比儒家的“君君臣臣”更早强调“看齐”君权，成为“中国第一代

左派”，法家则在韩非出道后以“法为君用”的铁血法、势、术而成为“中国第二代左派”。“中国第二代左派”主宰了秦汉以后的二千年中国，“中国第一代左派”则在春秋战国昙花一现后，又在 20 世纪中期以来横行华夏。

如果说“中国第一代右派”是公元前 400 年左右遭遇墨子党人禽滑釐围攻的道家一代杨朱，那么“中国第二代右派”则是公元前 300 年左右成名的儒家四代孟子，尽管孟子正式被皇家定为右派是公元 1368 年建立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怒删《孟子》书中的“右派言论”主要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等八十五条，下令将亚圣孟子像迁出孔庙，规定科举考试卷上不得有被删去的孟子语录。

由此可见，中国第一次由国家元首发起的“反右运动”，始于秦始皇公元前 213 年发动的焚书坑儒“反右运动”；中国第二次由国家元首发起的“反右运动”是十四世纪的明太祖朱元璋；中国第三次由国家元首发起的“反右运动”，应该是十七世纪的清高宗乾隆清世宗雍正了，而《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的产生背景，则是中国第四次由国家元首发起的“反右运动”，即“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

不过，“国家元首发起的反右运动”，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教主发动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之启迪。

易中天说：“挑战（道家）杨朱的，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

“墨子是为了天下，恨不得把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的；杨朱却即便有利于天下，也不肯拔一根毫毛。墨子一毛不留，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毫不利己，杨朱毫不利人，当然针锋相对，百家争鸣也就由此而起。”（《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94）

随后，反对“中右”的“墨子批孔”也开始了：

“争鸣是从墨子批孔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但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154）

儒家因为信奉“中庸之道”，其实是个“激进的中间派”或“亦左亦右派”：

“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那么，什么是中庸？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150）

墨子两次“反右”未得胜利，取得“反右”胜利的继往开来的韩非。

“中国第二代左派”的代表法家韩非，一心劝君主专制集权，其强制看齐的制度建设超越了墨家的“尚同”论，韩非的法，只是一心巩固帝王之法。左派韩非不只是仅仅号召“看齐”，而是谁不“尚同”就杀谁。韩非成为中国操作“强制”论反右派的祖宗。

易中天说：“韩非讲了很多。但要说明的道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险恶。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的死期就在眼前。”“韩非

甚至还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尤其是那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168）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187）

“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易中天说得好！

韩非理论始皇功，秦始皇完成中国第一次由君王发动的“反右运动”焚书坑儒。二千来中国的无数“反右运动”，皆是根植于墨子的“尚同”与韩非的“王法”。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除了有“中国右派”研究进入“基层右派”实名制的好处，让中国也有如同美国一样的灾难受难实名录——如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佈，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58,209人，韓戰36,574人），美國死在9.11事件中的人，他們的姓名，每年都要被一個個地朗讀一次——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还可以成为对墨子的“尚同”与韩非的“王法”的最新诠释！凡是不懂“尚同”和“王法”的“看齐之灾”者，皆可在《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中的32,000名“右派命运”中找到血淋淋的鲜活答案。

“三个可见”展示了秦晖对古今新老右派的独特论证

2013年3月，秦晖35万字的专著《共同的底线》亮相，五年六次再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共同的底线》如此畅销，可能有一个重要原因，其有“三个可见”：可见16种“新右派”，可见“新反右”11种招式，可见“新右派”共生术10招。

“三个可见”展示了秦晖对古今新老右派的独特论证，揭示了秦晖眼中真正的“中国特色”。

尽管国际上早已进入“‘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时代，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但秦晖认为中国仍然只有传统的“老右派”、“老左派”，因为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新右派”和“新左派”皆与现代化的福利国家有关，而中国今日远远不能称为福利国家。

秦晖直陈——

“我们说‘反右’是灾难，主要不是说那时没有‘右’的思想，而是因为权力剥夺了思想自由，迫害了思想者。……在西方，老左派主要指社会民主派，而新右

派如今主要指布莱尔这类介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人，而我们这里那种‘老左派’都几近于无，何论乎新？”（《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46）

秦晖进一步分析，解决今日中国的真问题，仍然在于要实行“老自由主义”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不是什么福利国家，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根本没有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社会保障，难道说毛泽东也是‘新自由主义者’不成？今天的中国更不是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水平不仅远低于社会党执政的欧陆各国，比据说是‘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低得多。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新报告，全球可比 90 个国家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经济安全指数’排名，最高的是瑞典，这一指数 0.977……而中国则为 0.356，只居第 58 名，属于最低一类……中国社会保障的缺乏并非由于‘新自由主义’得势，美国当然不同，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确是罗斯福社会福利政策的对头，说它加剧竞争与分化，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都是有理由的。但是即使是美国的左派，也没有指责‘新自由主义’盗窃国库化公为私……所以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民主主义’（像吉登斯所宣传的），我都是既不鼓吹，也不反对。我以为在中国的现状下炒作‘新自由主义’似有制造假问题之嫌。纯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与各种左派理论一样都有许多漏洞可供批判。但在现实中，中国如今社会公正和福利保障的缺乏确实并非‘新自由主义’所造成：正如中国如今自由不足也并非社会民主主义所造成一样。而盗窃国库就更与‘新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无关了。有专制但无福利国家，用不着专反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有寡头无自由放任，也用不着专反自由放任的‘新’左派。而反对专制与寡头，有‘老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足矣。所以，朋友们是否反对‘新自由主义’，我并不关心，我只关心：你是否反对‘老自由主义’！”（《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239）

因为没有“老自由主义”，所以今日中国有了 16 种“新右派”。

16 种“新右派”来自——

- 1、在“文明冲突”中产生的“右派”——积极推进西化者；
- 2、在“主义之争”中产生的“右派”——“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还乡了；
- 3、在“现代性背景”的“三争”下产生的“右派”——号称“第三部门”的“古典自由倾向”者可称“新右派”；
- 4、在“共同底线”下产生的“右派”——反对原教旨神权专制者是“右派”；
- 5、在“社会契约之争”中产生的“右派”——真想建立“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者是右派；
- 6、在“三个部门之争”中产生的“右派”——反对“以强制求私益”者为右派；
- 7、在“伪社会主义”与“伪自由主义”之争中产生的“右派”——主张“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的反对“伪现代化者”是右派；

- 8、在“民主社会主义”与“人道的资本主义”之争中产生的“右派”——“社会自由主义”者成为“右派”；
 - 9、在质疑“有商会而无工会”中产生的“右派”——“老左派”成为了“新右派”；
 - 10、在质疑“自信”的人群中寻找“右派”——怀疑“理性的自负”者自然是难以响应“几个自信”的“右派”；
 - 11、在“消极自由主义”的人群中寻找“右派”——谁叫好“消极自由主义”谁就是“右派”；
 - 12、在“反强制”的人群中寻找“右派”——“反强制”虽然比“反专制”温柔一点，但仍然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暴力”的“右派”；
 - 13、在“不公正的伪竞争”中寻找“右派”——具有强制色彩的列宁主义必然源源不断产生“右派”；
 - 14、在“许多‘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的论战中寻找“右派”——“许多‘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批判的对象必定“与右派只有五十步了”；
 - 15、在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稀缺时期寻找“右派”——中国苏区大杀‘社会民主党’的大肃反就是 1957 年反右运动的前奏；
 - 16、在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中寻找“右派”——反威权主义者为“右派”。因此也就了 11 种“新反右”。
- “新反右”11 种招式是——
- 1、指责“新右派”们是“混淆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的“新的思想僵化者”，“新僵化”成为“新右派”的新代号；
 - 2、指责“新右派”们对毛泽东时代持“内部否定”（全盘否定），因此“成为一种新的僵化”——凡质疑毛泽东时代者皆是“新僵化”（“新右派”）；
 - 3、指责“新右派”们对“大跃进”持“内部否定”（全盘否定），“新右派”们皆有“稻草人谬误”；
 - 4、指责“新右派”们对“圣上”不“内部肯定”；
 - 5、指责“新右派”们没有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分法”；
 - 6、指责“新右派”们不懂“黑暗”来自执行者而非“圣上原意”；
 - 7、指责“新右派”们不懂“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的老祖宗是美国资本家；
 - 8、威胁“新右派”：咱们“新左派”是既被国内‘领导层’看好，又‘受海外学界赏识’的“奉旨讨逆”；
 - 9、警告“新右派”（自由派）：你们已“言论和活动都备受控制”；
 - 10、控告“新右派”乃一切灾难的根源；
 - 11、向“新右派”们宣布为“文革”平反；
- 面对 11 种“新反右”招式，信奉“以德报怨”的“新右派”以共生术相对。
- “新右派”共生术 10 招是——
- 1、批左的焦点，往往是新老左皆不可否认的事实；
 - 2、以“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艺术说“沙俄”；

- 3、以“重合”求共生，分割马克思与斯大林而分而治之；
- 4、以“双反”求共生，追求“自由（共生）优先于主义”；
- 5、以“公正自由优先于繁荣富强”为核心价值，远离“主旋律价值观”；
- 6、从“共同底线”走向共生；
- 7、以“激进的中間派”为共生前沿基地；
- 8、以“分开走，一起打”促进共生；
- 9、“同化”也是一条共生曲径；
- 10、以博弈抵制强制追求共生。

与易中天将“左右派”标准定为是否看齐“尚同”、“君君臣臣”不同，秦晖将“新右派”、“新左派”的划分标准简明为两个字：强制。

“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乌托邦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可以实现的理想’同样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摆脱‘以强制求私益’的“反强制”者是“新右派”。具有强制色彩的列宁主义必然源源不断产生“右派”。“强制性的确是苏联式制度的突出特征”。“强制是万恶之源”！

向“爱强制”方向进行者就是“新左派”：“如今的许多‘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他们的‘头脑’与‘良知’并没有问题，也富于创新精神，然而他们创新的方向已经很难说是人文主义的科学化与科学主义的人道化。”（《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27）

“直到如今，缺少社会民主主义成分仍然是中国‘左派’包括所谓‘新左派’或‘自由左派’在内的一大弊病。”（《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8）

本文在后面将以专章细述秦晖的“左右观”。它可以说是对《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最新的导读，让人看到“中国右派”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中国右派”研究进入“基层右派”实名制

历史学家傅斯年說，史學的進步必須不斷地發現新史料——“史學的對像是史料”，“史學的進步歸功於史料的增加”，“治史便是整理史料”（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据此可见，《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等“中国右派名录”问世，标志“右派”研究进入实录“基层右派”大数据新阶段，它将让人们更加全方位地研究“反右运动”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虽然在 1958 年就有一些国际学人对中共“反右运动”进行了报道与质疑，但对中共“反右运动”的系统研究，是在二十年后，即中共开始“改正右派”的 1979 年。从 1979 年至 2019 年，四十年来，“反右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反右运动”史料初步搜集阶段、“反右运动”深入反思阶段、“右派维权”阶段、实录“基层右派”大数据新阶段——

第一阶段“反右运动”史料初步搜集阶段，代表作是撰写于 1979 年 10 月的《中国的反右运动》，作者是英国人纳拉纳拉扬·达斯，十年后由欣闻、唐明译，华岳文艺出版社于 1989 年 7 月第出版。因为此书是作者“我向新德里贾瓦哈拉

尔·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博士论文……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该校中国问题专家加吉·杜德教授的精心指导，她纵览全书，不仅帮助我处理了许多学术问题，而且指点我解决了不少学术障碍。可以说，没有杜德教授的有力帮助，本书的问世是绝不可能的。”（《中国的反右运动》，[英]纳拉纳拉扬·达斯，欣闻、唐明译，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第 1 版，P2）

据悉，“加吉·杜德夫人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五十年代中期受聘于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亲历了‘反右运动’），六十年代初返国后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八十年代中印关系解冻后曾多次应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和交流。”（同上）

这似乎可说，第一阶段的“反右运动”研究，主力是英国学者和印度学者。其研究目的有三：“一、反映在共产党治理七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内情和紧张关系；二、洞察异端邪说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共产主义社会允许存在的限度；三、考察处理异端邪说的方式和动员群众批判异端邪说的方法。”

17 万字的《中国的反右运动》，全书分为四章，论述了“反右运动”的根源、百名大右派及其观点、“反右运动”的两个阶段、“反右运动”的初步结论。

此书的特点是，首次详列了“反右运动”大事记和《人民日报》反右社论，百名大右派姓名及著述、言论，并附全国人大作公开检讨的大右派名单。这就让人一册在手，粗通反右。

如书中对“右派主要特征”概括了四点，并指出了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的区别——

“中国 1957 年中‘右派’的主要特征又有些什么呢？根据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颂扬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反对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比如外交政策、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五大政治运动等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否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进行建设的能力。4、反对共产党在政府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把党在某些基层组织内的领导，对高等教育学府、新闻报刊、出版社的领导，撤出去产……这些右派分子企图‘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有。他们不同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仍然享受‘人民’的地位，反革命分子被剥夺了做‘人民’的权利……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当时的中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包括地主、买办等；另一个剥削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的反右运动》，[英]纳拉纳拉扬·达斯，欣闻、唐明译，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第 1 版，P67、68）

对百名大右派的右派观点，书中梳理了 16 条——

“1、党取代了政府机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1957 年 5 月 8 日在党的整

风组织的第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指出……；2、党外人士没有权力（章伯钧说……）；3、民主党派的成员不能够参加决策——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说……；4、民主党派正走向灭亡（罗隆基说）；5、共产党员有特权（知名右派分子黄药眠说……）；6、只是形式上的民主（沈阳师范学院共青团宣传部部长张百生说……）；7、法律机构不健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著名人士黄绍竑抱怨道……）；8、苏联不友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在反右运动已经发动起来的时间内，竟仍然从三个方面列举……）；9、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家……）；10、民族资产阶级不需要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工商业者深入进行思想改造，必须进行积极工作。章乃器在5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篇社论时说……）；11、教育机构里的党委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著名领导人陈铭枢坚持一定要废除教育机构里的党委会……）；12、不适合科学发展的空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临时领导小组发表了一个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由5名科学家签名发表，这五人中有曾绍伦、钱伟长、童弟周、华罗庚……曾绍伦和钱伟长后来成为批判的对象……）；13、官僚主义操纵了文艺创作（《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秦兆阳……）；14、错误的人事政策（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钱家初〔武宜三按：应是千家驹〕……）15、盲目模仿苏联（……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朱玉贤〔武宜三按：应是朱有璈（huan）〕在1957年5月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中国的反右运动》，[英]纳拉纳拉扬·达斯，欣闻、唐明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P72-85）

《中国的反右运动》一书的遗憾，是对“反右运动”的根源挖掘不深，只盯住了1956年毛泽东的“百花齐放”和苏共二十大、中共八大及东欧风波，没有上溯“延安整风”、“上海左联”，更没有追根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第二阶段“反右运动”深入反思阶段，代表作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剑桥中国史》第14卷、15卷），主编为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关于“反右运动”的专章《党与知识分子》、《党与知识分子：第二阶段》和《1949-1976年毛泽东的思想》，从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两个角度，将“反右运动”的前世今生梳理得深入浅出，令人信服，是对海外“反右运动”研究的集大成。唯一不足，仍然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论证古代华夏士子“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传统对当代知识分子甘当“右派”的深刻影响。

《党与知识分子》开篇就说，“反右运动”源于“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

“1949年后，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党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其广度与深度与历代儒教强加给文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党又试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发挥其专长。这种矛盾使政策在压抑和宽松之间变换。在压抑期，知识分子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而在宽松期，党又让知识分子承担一些责任，享受一些特权，以获得他们的合作，进行现代化建设……党实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直到知识分子看来不愿工作了为止。然后就放松控制，直到其政治控制似乎受到威胁。在相对宽松时期，党鼓励（至少允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争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也鼓励）人们批评官僚主义，以根除这个制度的弊病。中国文人的历来的传统是，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国家服务，如果政府背离了儒教原则，也有责任指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 1 版[内部发行]，P231）

在《1949 - 1976 年毛泽东的思想》一章中，首先强调了“反右运动”源于毛泽东的思想变化：“1957 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论是其观点还是其品格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他此后的 19 年。因此，以 1957 年为界，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许多方面的探讨都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毛晚年的许多至关重要的思想是在 1957 年以后才出现直到形成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 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3）

毛泽东抛弃“契约论”的哲学错误加剧“反右扩大化”

这一变化的核心是毛泽东将“否定之否定”变成了“肯定否定”——

“1958 年 1 月，当《工作方法六十条》作为草案下发时，毛署上了他的名字。草案中包括了毛的这样一句话，10 年后，我作了如下翻译：‘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见两本 1960 年印的供内部使用的毛的著作的重要汇编《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在延安时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成员的一位学者在其新作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肯定否定的规律。这是一个他并未进行更多地论证而留给我们的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观念中，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换言之，‘肯定否定’所引发的是不断变化和意志的作用，而不断变化实质上就是‘不断革命’（这并不奇怪，因为在 1958 年 1 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两个词被并列使用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 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55、56）

毛泽东的“肯定否定”实验，大约是从“尊敬高岗”转为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开始的。

“早在延安时，高岗就和毛主席关系甚好。高岗作为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受到了毛泽东的尊敬。毛泽东还认为他是对基层情况了解透彻的地方干部。他们两人很合得来。1949 年后，毛泽东对高岗在东北地区所取得的成就

印象极深，并且觉得高岗是个能够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富有才能的领导干部。在对高岗怀有好感之时，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正怀有某些不满。毛对他们在经济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提倡谨慎行事尤为不满，他总是希望加快步伐。1953年上半年，在与高岗几次私人交谈中，毛泽东都流露出这种不满。不管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高岗将此示为一种信任的暗示，他看到了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机会。”（《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2版[内部发行]，P105）

但是，毛泽东对高岗很快进入先“肯定”再“否定”的“肯定否定”模式——

“（1953年）12月19日晚上，（毛泽东）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委派陈云去高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要他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联合。’”（《毛泽东年谱1949 - 1976》[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P210）

“（1953年）12月24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泽东年谱1949 - 1976》[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P211）

结果，逼得高岗自杀——“（195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高岗自杀问题发通报给苏共中央。通报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的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系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毛泽东年谱1949 - 1976》[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P273）

1958年1月，正是“反右运动”进入“具体实施惩罚右派”的阶段，由此可说“反右运动”正是毛泽东将“否定之否定”变成了“肯定否定”的结果——

请看毛泽东1956年如此肯定知识分子：

“毛在1956年1月号召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温和的、理解的态度……他评论说：‘有些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指知

识分子)，老子是革命！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24）

“1956 年春夏之际，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对共产党和其它社会关系的问题，对是非关系问题，都采取了非常温和的态度。毛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于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26）

“1957 年月，毛本人还为他称之为花了‘一点钱’就‘买了’的资本家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辩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79）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文中甚至猛烈批左批斯大林：“你只能赞同，不能反对；你只能为他的功绩和唱赞歌，而不能批评；如果你批评了，他就会把你当作敌人，你就会有被送进集中营或被处死的危险。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所谓‘左派’，他们打着左的旗号，但是他们并非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比如，斯大林就是这么个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33）

即使是在 1957 年 5 月 2 日，《人民日报》还在社论中传达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36）

可是仅仅十来天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笑脸就变成了怒目：“但到了（1957 年）5 月中旬，由于持续不断地对党的猛烈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认为在党员中有一些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倨傲警告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从此以后，毛日益看到的处处都是‘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37）

1958 年 3 月，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知识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1958 年 3 月，他还宣称：‘自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年

轻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P38）

1958年4月6日，在汉口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强调国内敌人有三千万：“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P78）

1957年下半年后，毛泽东将自己曾经肯定过的事件与人物变成否定，有下面一些典型——

1. 从崇拜马克思神圣变马克思也是可以超越的——

据王任重文革检讨书《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博讯2006年12月6日），毛泽东1956年11月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自我表扬“我们做的也超过了马克思”：

“1958年省委在武昌和庐山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主要是传达讨论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问题，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列宁做的和说的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超过了马克思。因此我认为提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是对的。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打掉我们一些同志的自卑感，批判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特别是批判忽视学习主席著作的错误倾向，并且通过了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以工作为中心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惇等人曾经提出超过毛泽东，超过党中央的错误言论（在我的报告记录中也有一句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的话，记不起当时是怎么讲起的了）……”

只是因为“我们做的也超过了马克思”这句话引起一些干部有了“超过毛泽东，超过党中央的错误言论”，毛泽东后来才没有直接自诩“已超过了马克思”。

2. 从肯定苏联变否定苏联——

毛泽东对苏联由肯定变否定，主要表现在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肯定变否定。

“1957年11月，毛第二次出访莫斯科……他谈到他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P69）

“1958年3月，毛说：‘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压力。’1958年4月，他又

指出：“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71）

“1958 年，毛和赫鲁晓夫的关系突然恶化，其程度远远超出对大跃进方针的必然分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71）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毛在八届十中全会对此作了简要概述：‘1959 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十月在我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 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又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中国和苏联）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73）

“党的八大二（五）次会议上，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体现了一种愿望，即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48）

“人们使毛确信，他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正确的阐述，任何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显然是修正主义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91）

“从 1963 年 9 月 6 日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这一期间，中国发表了 9 篇文章回击苏联人。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文章（“九评苏共公开信”）的作者（审定者）是毛。”（《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74）

3、从肯定“五四精神”变否定“五四精神”——鲁迅精神是“五四精神”的代表，但毛泽东却表面肯定鲁迅精神后，实质否定鲁迅精神——

“毛泽东虽然在早些时候把鲁迅称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在延安讲话中，却否定了鲁迅所代表的观点。鲁迅提倡西方的文学形式和西方思想，而毛泽东却敦促作家们回到传统的民间文学方式去。鲁迅的著作揭露了社会黑暗面，对于民众和权贵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没有正义感同样进行讽刺，但毛泽东则号召文学为党的目标服务，歌颂群众。作家们不能仅仅依据事实和自己的观察来批评现实，他们要把现实描绘成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或党和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 2 版[内部发行]，P243）

“（1957 年）3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新闻出版界座谈会。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出席。康生、陆定一、胡乔木、

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是可能会写……”（《毛泽东年谱 1949 - 1976》[第 3 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P103、105）

这种对鲁迅的“肯定否定”，必然就会出现“反右运动”。

4、从肯定孔子变否定孔子——

“1964 年，毛为寻求灵感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追溯，使得他对孔子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1964 年 2 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春节座谈会上，毛在批评这位圣人不重视体力劳动，对农业生产缺乏兴趣的同时，又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孔夫子也相当民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 198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P57）

然而十年后，1974 年，毛泽东却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

5、从肯定马寅初变否定马寅初——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当时（195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人口问题，马寅初受到鼓舞，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畅谈了他的人口问题的观点，他指出我国人口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马寅初的发言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结束之后，马寅初更加紧了人口问题的研究……7 月 5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发言《新人口论》……但是，随着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许多学术观点也被打成是向社会主义进攻，与马寅初观点相仿的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如费孝通、吴景超等也被错划为右派。有些人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是搞政治阴谋。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58 年 6 月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 4 月所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这说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有了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四卷 1976 - 1995，邓力群总顾问，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P39）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发言表示赞同”，但仅仅一年，毛泽东就变卦了！这一言而无信的“没有契约精神”，导致马寅初沦为“大右派”——“1958 年 4 月 3 日，北大党委就决定对马寅初进行批判。1958 年 5 月 4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校庆纪念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从此开始，在北大就开展了对马寅初的点名批判……据统计在 1957 年底到 1960 年底，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

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就达 160 余篇……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大批判，马寅初本着一种捍卫真理的决心，对那些毫无道理的批判、指责、围攻加以反驳和回击……他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说：‘我虽年近 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对马寅初的学术观点横加批判，任意上纲，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迫使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离开北大。在这场大批判中使用的围攻批斗、无理辱骂和大字报等方法在以后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中都得到使用。这场大批判对我国经济发展、学术研究和民主建设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四卷 1976 - 1995，邓力群总顾问，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P40、41）

6、从肯定“百花齐放”变否定“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 - 3 月 1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出了“人民有言论自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不行的”。这一带有“契约”性的君子承诺，受到章伯钧、黄炎培、马寅初等与会一千八百多各方面人士的好评。毛泽东随即提出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但是，就在就在全全国各地党外人士据此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开门整风的文件对党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时，毛泽东却在三个月内十一次秘密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最终在 1957 年 6 月 17 日定稿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两天后 6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修改稿与最初的讲话相比，基本上否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人民有言论自由”也设置了重重障碍，然后以此修改的文稿对众多知识分子的“意见”进行划“右派”。

这就暴露“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毛泽东否定了国际公认的“契约论”，也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和“天子无戏言”。

毛泽东当然有修改自己讲话和文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有两个标准，如果要以修改后的文章为“反右运动”指导，那么你就要以修改后的文章发表时间为界，也就是 1957 年 6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界，以前的意见，不能作为划右派的标准，此后的才算。然而在所划的所谓 55 万右派中，几乎所有人的“右派言论”都发表在 1957 年 6 月 19 日以前。这就让毛泽东和其党都公然违背了公认的“契约论”。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要遵守“契约”，“言必行”。

先请看毛泽东对“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承诺——

“（1957 年）2 月 27 日 - 3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出席会议。2 月 27 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

（一）两类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3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对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讲话发表感想和意见……毛泽东说：刚才有人提到，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指导思想？……世界观的问题只能是逐步地使人了解，不能强迫人家相信。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家相信，也不能强迫人家不相信。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 1949 - 1976》[第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P80、82、83、86）

再看毛泽东对“人民有言论自由”的否认——

“（1957 年）5 月 27 日，（毛泽东）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四稿……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三稿中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节，改写一段话和加写一段话。（一）改写的一段话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年谱 1949 - 1976》[第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P164、165）

显然，这些新加上的“阶级斗争为纲”意思，完全架空了前言，让三个月前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形同虚文。

所以，将“反右运动”简单地归于“引蛇出洞”，并没有抓住要害，“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毛泽东公开否定国际准则“契约论”。所以此后，毛泽东可以突然将肯定过的“向苏联学习”否定为“苏联修正主义”，将自己激情称赞的“唯我彭大将军”否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将几十年肯定的刘少奇、林彪等“亲密战友”否定为“叛徒、内奸、卖国贼”，将“红卫兵”否定为“五一六分子”……

杨朱、庄子、孟子、荀子确立华夏“右派”传统

要想真正读懂“中国右派名录”，准确理解“右派”内涵、外延的变迁，须要回

顾一下“右派”的发展史。虽然“反右运动”始于1957年，但“右派”却源远流长，近起于法国大革命，远萌芽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以往流行的观点，多认为“右派”是舶来品——“右派”源于二百多年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划分标准是激进与保守：激进为左派，保守为右派。

但近年学术界的新研究则发现，其实“左派”、“右派”早已存在于华夏文化史，最早可上溯到“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划分标准是君权与民权：尊崇君权者是左派，维护民权者为右派。

据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说：“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诸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005）

易中天认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学说中，明确可见左右之分：“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必须也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186）

透过易中天的研究，可以看到，若以君权与民权为左右划分标准，则儒、墨、道、法四家中，道家的杨朱、庄子是极右，儒家的孟子是中右，亦儒亦法的荀子是普右——杨朱、庄子、孟子、荀子是中华文化史上最早的“右派”！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006）

杨朱的右派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这就与当时的左派墨子的“墨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墨子主张“互惠互利，兼爱天下”。杨朱却坚持“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93）

于是墨家开始了“反右运动”。

“墨子是为了天下，恨不得把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的；杨朱却即便有利于天下，也不肯拔一根毫毛。墨子一毛不留，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毫不利己，杨朱毫不利人，当然针锋相对，百家争鸣也就由此而起。”（《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94）

“挑战杨朱的，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这位学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带领三百个同学驻守在宋城的墨家大弟子。禽滑釐问：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干吗？杨朱说：世道不是一根毫毛就能拯救的。禽滑釐说：如果

能，愿意吗？杨朱不理睬他。禽滑釐出门，把这事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笔巨款，你干吗？禽滑釐说：干！孟孙阳又问：砍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禽滑釐不说话。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微不足道；与肢体相比，肌肤又微不足道。这道理谁都懂。但，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那么请问，难道因为毫毛微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禽滑釐表示无话可说。事实上，当孟孙阳问他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行不行时，禽滑釐就已经清楚，后面等着他的问题必定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干不干？那也能同意吗？好嘛！脑袋不能砍，腿就能剁吗？腿不能剁，肉就能挖吗？肉不能挖，皮就能撕吗？皮不能撕，毛就能拔吗？要能就都能，不能都不能。”（同上）

“墨家是讲逻辑的，所以禽滑釐无话可说。孟孙阳的话，却意义重大。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局部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是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请问那整体利益最后还有吗？所以，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大江大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如果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还会有长江、黄河吗？同样，如果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牺牲了，请问，还有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天下大利吗？因此，别把小民不当人。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权利。”（《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94）

这样说来，墨家的第一次“反右运动”失败了！真是大快人心！

庄子本属于老子一派的道家，但老子的《道德经》整个是为君主出谋划策，让帝王以无为的方式达到有为的愚民。从《道德经》通篇皆是“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三十六章》）的帝王术，可以认定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皆是唯君权是奉的“左派”。但庄子虽然从属于道家，却是以无为求无为的彻底无为的个人主义，属于道家中的维护民权与追求自由的“右派”。

庄子批判君权的名言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易中天分析了庄子与老子的不同，在于力倡“民如野鹿”的个人主义：“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君王如只会高高在上的树梢），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老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P53）。

对孟子的“右派”言论，易中天这样评论：“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君权。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

第三。”（《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78）

接着说：“孟子从来就没反对过君主制，也不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但他跟孔子一样，不讲平等，却讲对等。对等，就是我有义务，你也有；你有权利，我也有。”

对于“右派”孟子与“左派”孔子的差异，易中天举例：孔子是温和地要求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实现“君为臣纲”，而“孟子却没那么温良恭俭让。他的说法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什么人，我就把你当什么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呵呵，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81）

至于荀子的“右派”言论，易中天的发现是：

“荀子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作为战国晚期的思想家，他很希望做一次总结性发言，何况儒家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历史的使命，就交给了荀子。那么，荀子要回答什么问题？天道与人性。这恰恰是孔子不讲的。子贡就说，从没听老师提过这两个话题。其实准确地说，孔子是讲天命不讲天道，懂人心不讲人性。”（《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154）

“道家的理解，是‘天道无为’；荀子的理解，则是‘天道自为’。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面的意思非常清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社会的集体意志或某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156）

“君子的常体又是什么？自强。荀子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敬其在己者’，小人‘慕其在天者’。也就是说，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这才能天天向上。整天盼着天上掉馅饼，那是小人的想法……于是，它在后来便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没错，天自为，则人自为；天行健，则人自强。这就是荀子思想的逻辑结论。”（《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易中天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P157）

孔子强调“君权天授”，历代帝王都自称“天子”，荀子则在孟子强调“君权民授”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与帝王无任何亲近，一切皆“人自强”。

至此，庄子、孟子、荀子确立了中华民族“右派”的鲜明特征：不唯上不唯君，只唯实只唯民！

两千多年来，无论是“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隋唐五代元明清”，朝朝代代都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右派”——魏晋的“竹林七贤”，明代的“东林党”、李卓吾，清代的康梁维新党，民国时期的胡适、鲁迅……江山代有“右

派”出，各领风骚在民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右派”的新定性

如此深厚的中华“右派”传统，在 1949 年后的“红朝”更是蔚为大观。

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表述——“红朝右派”是因“扩大化”错误而产生的——

“1957 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共约 55 万人）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接下来的叙述，表明“反右运动”之后又有“反右倾运动”，加上“反右倾运动”中补充的新右派，“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就远不止 55 万人了！

“从 1958 年底到 1959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据说，1961 年曾对“右派”进行了摘帽平反，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遭遇了朝令夕改：1962 年 10 月又因重提“千万还要忘记阶级斗争”而停止平反右派，已经摘帽的“右派”，也仍然以“摘帽右派”享受管制——

“1960 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 年 1 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 1962 年到 1966 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 1962 年 9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

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76年10月到1982年底，全国累计有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四卷1976—1995，邓力群总顾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第2次印刷，P12）

“由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严重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有2名地、市委书记被定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千多名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党内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状况。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使党内民主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1962年7月，中共中央为纠正党委包揽政府部门业务的现象，转发华东局取消工业书记、农业书记、财贸书记、文教书记的名义，改变书记分兵把口的做法，把应由政府部门承办的业务交由政府部门办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党政不分的问题，没能解决。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根据中央部署，1963年2月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在河北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逐步展开。1964年12月以后，省委对1962年已经正确甄别解决了的1959年的所谓‘右倾’问题，又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高度进行批判，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1,148千字，P574）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指示》；6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全省即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全省原划定的34,800余名右派分子中，属于多错划的达98.6%。他们大都被调离原工作岗位，下放劳动改造。”《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1,200千字，P355）

“1958年春至1959年8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省先后展开了‘整风补课’、‘反地方主义’和‘反右倾’斗争。1961年春，全省又相继开展了‘反瞒产私分’、‘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先后有53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工人、农民

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处分的党员有 92,303 人，占全省党员总数的 6.3%.....在‘整风补课’和‘反右倾’斗争中，共处分省委委员、候补委员 17 人，占这一届委员、候补委员总数（56 名）的 30.3%.....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健民被错误地打成‘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夏征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刘秉琳、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省委委员、副省长袁子扬等分别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党宗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 1 版，1,200 千字，P356）

“根据 1961 年 6 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和 1962 年 4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精神，省委和各级党委自 1961 年 7 月至 1963 年，对几年来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平反。据统计，全省在 1958 年‘整风补课’、‘拔白旗’，1959 年反右倾、‘反瞒产私分’，1960 年冬和 1961 年春‘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共重点批判处分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 147,525 人，已甄别平反的 148,470 人，占受批判处分的 99.8%.....另外，还有 24 万多名受批判、处分的工人、农民也全部被甄别平反。为 1,143 名错划右派作了甄别纠正（1962 年中央指示，停止对右派的甄别工作）。此外，还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 17,087 摘掉了右派帽子。”《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 1 版，1,200 千字，P356）

“中国 1957 年中‘右派’的主要特征又有些什么呢？根据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颂扬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反对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比如外交政策、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五大政治运动等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否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进行建设的能力。4、反对共产党在政府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把党在某些基层组织内的领导，对高等教育学府、新闻报刊、出版社的领导，撤出去产.....这些右派分子企图‘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有。他们不同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仍然享受‘人民’的地位，反革命分子被剥夺了做‘人民’的权利.....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当时的中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包括地主、买办等；另一个剥削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的反右运动》，[英]纳拉纳拉扬·达斯，欣闻、唐明译，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第 1 版，P67、68）

邓力群的反右研究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的总顾问是邓力群，故而有人称出版于1996年的“国史通鉴”中的反右叙述，可称“邓力群的反右研究”。

“邓力群的反右研究”，充满了肯定“反右运动”的春秋笔法。归纳起来有17条——

1.以“反右派斗争”为题记述“反右运动”，这就回避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运动”的厌恶，让“反右运动”在“反右派斗争”的褒奖中有一种“正能量”感。其开篇是这样定调的——

“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为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这次党内整风要以毛泽东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和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整风的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检查思想上和各方面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纠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得到大的提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一个较大的改进，从而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努力。”

2.强调“反右运动”是“和风细雨的思想运动”——

“因为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运动，所以中共中央要求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形式，或者开小型的座谈会的形式，而不是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在此基础上，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鼓励大胆批评，而且对在整风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只要不是严重的违法乱纪，也一律不作组织上的处理。同时，中共中央一再表示，热诚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

3、突出毛泽东以“虚心、诚恳的态度”欢迎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

“为了搞好这次整风，毛泽东再三告诫全党，以更虚心、诚恳的态度，欢迎各方面提出的公开批评，认为这批评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改进工作。5月4日发出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指出，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的各种公开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其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和间断’；整风开始后‘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同时，这个指示也指出‘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

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 ”

4、称赞“党对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举行了13次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有70多人先后发言，对共产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不少发言虽然尖锐，但很中肯。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5、将“反右扩大化”的责任推到“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但是，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中国共产党整风欢迎批评的机会，放肆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他们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使一些机关，特别是大专院校中，大字报铺天盖地，造成了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人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党天下’，并公然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甚至提出‘轮流坐庄’。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并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知识分子中也有极少数人敌视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一些违反中国共产党利益的言论。这种倾向，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

6、得意“主动权只在一个短期内掌握在右派”——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特别是新党员中，有些人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遥相呼应，亲如兄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了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企图消灭共产党。文章警告说：右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夹紧尾巴，改邪归正；再一条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选择哪条道路，主动权只在一个短期内掌握在右派手里。”

7、赞扬“引蛇出洞”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195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指出，‘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有关领导要引起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研究反驳的问题。’遵照以上精神，中共中央统战部继续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除了有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外，极少数人看到中共并没有反击，所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气焰也更加嚣张。”

8、歌颂吹响“反击右派分子”冲锋号的“6月8日”——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

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击右派作了部署。指出，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 1%，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所吓倒。要工人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对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的反动分子，要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毒素来’，并对他们的反动言论不加修饰地全面报道，到适当时候再进行鉴别、批驳，并由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并认为，如果做得好，整个过程有 1 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要求每个党报都要准备几十篇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便于在适当时候陆续发表。反击右派分子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通过对一封给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的匿名恐吓信的分析，指出写匿名信的人是企图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正告极少数右派分子，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许可的。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在共产党内外全面展开了，特别是在高等院校和民主党派中，反右派斗争更加猛烈，并同样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

9、大声欢呼“工人说话了”，小声致歉“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对立了起来”——

“（1957 年）6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的社论。社论说：‘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决的斗争的决心。’这个社论还说：‘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对立了起来，从而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

10、称赞毛泽东对文汇报的批判是反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欢呼“北京大学学生中右派占 1%至 3%”——

“（1957 年）7 月 1 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批评《文汇报》‘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方向。’同时还指出，5 月 8 日到 6 月 7 日这个期间，中央要求报纸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目的就是让‘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面目，从而聚而歼之。这篇社论成为全国反右派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把反右派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7 月 9 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象北京大学，

学生中右派占 1%至 3%，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 10%左右的右派。因此还要挖，不要怕天塌下来。”

11、对“青岛会议”制定“深入挖掘”的“扩大化”反右政策轻描淡写——

“7月17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书记会议，对反右派斗争作了进一步部署。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断定，‘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要再用几个月的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决不能草率收兵。批判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还赞扬‘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毛泽东以上的这些讲话，使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断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轻率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2、肯定毛泽东意图下的反右具体政策规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在反右派问题上，也先后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8月25日《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告》中指出，这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经过大辩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给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以社会主义教育。因此，既要反对草率收兵，也要防止采取一些简单的不适当的斗争办法。8月29日《关于对右派分子不宜过早地作组织处理的指示》中说，对于右派分子的斗争，应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彻底揭露，把他们搞臭，但不宜过早地作组织处理。9月4日《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中要求，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没有改变成分的，即照原来的成分对待，已经改变了成分又进行捣乱破坏的，可以分别恢复他原来的成分，戴上原来的帽子，但不要叫右派分子。富农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人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特别是10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什么样的人应划分右派分子规定的十分具体、明确。”

13、肯定《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欣赏“极右分子”规定——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规定：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

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况，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以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14、对“畸轻畸重”严重扩大化一笔带过——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公布以前，各地大都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实行中有‘畸轻畸重’的地方，而主要的是偏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公布以后，各地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和很好地执行，同时该标准中的一些条文不易把握，每个人的理解和判断上也会有差异。所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趋势非但没能扭转，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不断增加。

15、将反右数字定为“全国实际上共定了右派分子 552877 人”——

“1957年6月29日，估计‘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到7月9日中央统计‘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8000人’，8月17日，中央转发北京市的报告中说，到8月7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其中高等学校有4230人。9月统计，中央国家机关中‘共有右派分子4837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5%。’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中说，全国有右派30万，不久，

他又说有 40 余万人。1959 年的中央文件说‘约 45 万人’。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的统计，全国实际上共定了右派分子 552877 人。”

16、回避反右运动是“体制”问题，只承认“主观主义的错误”——

“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时候，对这种进攻给予坚决回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加上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些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许多正确的、善意的批评，当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从组织上进行了过份的处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全部是降职、降薪，有的被开除了公职，监督劳动；学生有的留校察看，有的被开除了学籍，实行劳动教养。这就使许多长期受到不公正的甚至非人的待遇，特别是他们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由于被长期剥夺了为国家发挥才干的机会权利，不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尽自己的力量，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无法挽回的损失。不仅如此，由于对整个知识界的估计产生了偏差，如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把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列入了剥削阶级范围；1957 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中也说：‘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都有一部分右派，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所以对广大的知识分子一味地强调思想改造，对他们不尊重、不信任，影响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反右派扩大化还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一言堂’得到发展，违法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全党整风，以达到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初衷。发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17、回避“摘帽右派”与“右派”无异问题——

“反右派斗争，经历了 1 年左右的时间，到 1958 年 6 月前后基本结束。从 1959 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分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 1964 年先后进行了 5 批，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但大多数并未平反。1978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9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过来，从政治上分清了是非。到 1980 年共改正了 54 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只有少数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由此可见反右派扩大化的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四卷 1976 - 1995，邓力群总顾问，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P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四卷 1976 - 1995，邓力群总顾问，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P12）

邓力群的上述观点，似乎有邓小平的指示为依据。邓小平 1980 年 3 月 19 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说——后收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1957年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四卷1976-1995，邓力群总顾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第2次印刷，P665）

综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当代右派”的描述，可以发现，“当代右派”相当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法家，而左派则类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儒、墨三家，“大同书”与“兼爱”是道、儒、墨三家中皆有的共同底线，“姓社为左派”者皆是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复古理想派，“姓资为右派”者则是向往现代法治的“新法家”。

司马迁理想的孔子“反右”艺术

中国传统的哲学流派中，早有“墨离为三，儒分为八”，分化出左右两派的“三墨八儒”的故事。《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八儒即战国时期儒家分化成八个派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政氏之儒——子张即颛孙师，漆雕氏即漆雕开，为孔子弟子，子思即孔汲，孔子之孙，孟氏即孟轲，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孙氏即荀况，又称孙卿。

这八儒中，孟氏之儒是可称极右的儒家右派，其因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轻国轻君，在明朝的“反右运动”中被朱元璋“删孟”——明太祖怒删《孟子》书中的“右派言论”主要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等八十五条，并将亚圣孟子像一度迁出孔庙，规定科举试卷上不得有被删去的孟子语录。

也许司马迁早已预料后世会君王残酷“反右”，早在撰写《史记·孔子世家》时，就编造了孔子温和“反右”的故事，以此警示后世帝王，虽然帝王难免“反右”爱左之天性，但切不可忘却宽恕之道。

儒学的左右以三纲为分水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唯上唯君，那么唯上唯尊者可称左派，流露个人至上，主张不必事事唯上唯尊者的就是右派。太史公编撰的故事是：孔子厄难陈蔡后，弟子中出现了怀疑儒学“吾未仁邪”的反思潮流。孔子为了统一团队意志，防右于未然，立即发起一个识别儒家

弟子左右派的“引蛇出洞”问答会，由此指责子路极右，子贡右倾，赞扬颜回真左派。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编造的“孔子厄难陈蔡”背景是——

孔子（63岁）迁居到蔡国的第三年（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吴国军队攻伐陈国。楚国出兵援救陈国，驻扎在城父（今河南平顶山西北）。听说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楚昭王派人以财物聘请孔子为楚相。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陈国、蔡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刺抨击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他长久滞留在陈国、蔡国之间，众大夫所作所为都违反仲尼的心意。如今楚国，是大国，派人前来聘请孔子，倘若孔子在楚国起用，我们这些在陈国、蔡国主事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共同调发役徒将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没法行路，断绝了粮食。随从的弟子疲惫不堪，饿得站不起来。但孔子仍讲习诵读，演奏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子路生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吗？”孔子说：“君子能固守穷困而不动摇，小人穷困就胡作非为了。子贡怒气发作。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个博学强记的人吗？”子贡说：“是。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啊。我是用一个思想贯穿于全部学说。”

原文——“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P3796）

今日学界认为，司马迁在这一节有两处不实。

其一，全祖望、钱穆皆指其关键故事“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与史不符。“梁玉绳引全祖望《经史问答》曰：‘当时楚与陈睦，而蔡全属吴，迁于州来，与陈远。且陈事楚，蔡事吴，则仇国矣，安得二国之大夫合谋乎？且哀公六年，吴志在来陈，楚昭誓死以救之，陈之仗楚何如，而敢围其所用之人乎？乃知陈、蔡兵围之说，盖《史记》之妄。而绝粮，则陈之被兵，楚昭之聘，亦为虚语。’钱穆曰：‘孔子之厄在吴伐陈之岁，而谓绝粮乃受兵围则不足信，自朱（熹）子已辨之。’”（《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P3797）

其二，“君子固穷”与“一以贯之”是孔子在两个不同时空所说的话，司马迁将其拼接到了一起，与事实不符：“以上孔子对子路、子贡所说的‘君子固穷’与‘一以贯之’两条，皆见于《论语·卫灵公》，但两条之间没有关系；而史公乃于第二条之开头加了‘子贡色作’四字，而与子路之‘愠’连在一起，合为一事，殊为不伦。崔述曰：‘多识’、‘一贯’之文，与‘绝粮’、‘固穷’之义不相蒙，自当别为一章。

《世家》连而及之，非是。”（《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中

华书局 2010 年 6 月版，P3798)

接下来，司马迁又继续编造子路、子贡的“右派”言论和颜回的“左派”表态——

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恨之心，就召见子路而询问道：“《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猜想我们还没有达到仁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猜想我们还没有达到知吧！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学说。”孔子说：“有这些缘由吗！仲由，我打比方给你听，假如仁者就必定受到信任，那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假如知者就必定能行得通，那怎么还会有王子比干？”

原文——“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 2010 年 6 月版，P3798)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论坛·先秦诸子》对子路反思孔子这一节的解说是：“孔子也明白他的学生们（对伟大儒学不被世人接受）有意见有想法闹情绪。怎么办呢？谈话，召见学生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谈话也不是找所有的学生，找谁呢，找学生干部。找了三个学生，子路、子贡、颜回。第一个找的是子路。孔子说，……是我们的主义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呢？从这句话字面理解，孔子是要反思自己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子路就是这样理解的。子路怎么反思呢？他说：……老师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仁爱，所以别人不够信任我们，还是因为我们不够智慧，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主张。孔子怎么说呢：有这说法吗？……孔子说，如果说一个仁者的条件是别人一定要信任他，那么伯夷、叔齐算什么？如果说智者的条件就是别人一定实行他的主张，那王子比干算什么？也就是不同意子路的反思。”

显然，子路这种怀疑主义和上级反思，属于违反看齐规则的“右派”。孔子不喜欢“右派”，但却没有组织力量来批判子路，更没有惩罚子路，只是继续寻求支持自己的左派——让子贡来谈谈。

司马迁说——

子路出去，子贡进入见面。孔子说：“赐（子贡）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所以天下没有国家能容得下您。老师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呢？”孔子说：“赐，优秀的农夫善于播种耕耘却不能保证获得好收成，优秀的工匠擅长工艺技巧却不能迎合所有人的要求。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学说，用法度来规范国家，用道统来治理臣民，但不能保证被世道所容，如今你不修明你奉行的学说却去追求被世人收容。赐，你的志向太不远了！”

原文：“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吾道非邪？吾何为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P3800）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论坛·先秦诸子》对子贡劝孔子“改革”这一节的解说是：“子路出去了，第二个学生干部进来，就是子贡。孔子照样又说了一遍。……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这个人大家知道，那比子路乖巧多了，子贡当然不会说先生主张不对，子贡怎么说呢？他说：……老师啊，哪里是您的主义和主张不对呀，分明是您的主义和主张太伟大了！伟大得比天还大，那当然容不下。唉，要不，老师不那么伟大，咱们别太伟大行不行？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一个好农民他能够精耕细作，也未必能有收成，一个好工匠，他能够巧夺天工，未必能让人人满意。一个君子应该做好自己的学问，掌握真理，但未必人家都能接受。你怎么老想到别人要接受呢？……你不想着怎么样掌握真理做好学问，老想着自己能不能被聘用，能不能被世道所容，你这个志向不远大呀！”

无疑，在孔子眼里，子贡虽然打着劝老师改良改革的旗号，也还是一个右派，只是比极左子路稍温和一点。孔子当然也只是让子贡出去，另找左派。

司马迁接下来的叙述是——

子贡出去，颜回入门进见。孔子说：“回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颜回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所以天下没有国家能够容纳。即使如此，老师推广而实行它，不被容纳怕什么？正是不被容纳，然后才现出君子本色！老师的学说不修明，这是我们的耻辱。老师的学说已经努力修明而不被采用，这是当权者的耻辱。不被容纳怕什么？不被容纳然后才现出君子本色！”孔子高兴地笑道：“有道理啊，颜家的孩子！假使你拥有许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

原文：“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P3801）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论坛·先秦诸子》对颜回赞孔子这一节的解说是：“子贡出去了，颜回进来。孔子照样还是那样一段话，颜回怎么回答呢？……颜回说，哪里是老师您的主义和主张不对，是老师您的主义和主张太伟大了，比天下还大，所以天下不能容。（这前面这个话跟子贡一模一样，但子贡接着怎样说，说咱们不要这样伟大行不行？颜回没有这样说。）……颜回说什么呢？虽然……虽然老师的主义和主张伟大到天下不能容，但是，老师，您还是要极力地去

推行。天下不能容我们，正好证明我们是君子！……如果没有掌握真理，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掌握了真理，那些有国者，那些掌权的人，那些执政的人，不采纳我们的主义和主张，是谁的耻辱？他们的耻辱！……我们不能见容于世，我们的主义和主张不能得到实际应用，有什么了不起！正好证明我们是君子！这话说得漂亮！结果怎么样呢？司马迁的记载是这样的：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颜家孩子真不错呀！要是有钱的话，我给你做管家。孔子非常的赞许。我认为……颜回说的最不靠谱，而孔子却对颜回大加赞扬。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说明，即便孔子那样的千古圣人，也是喜欢顺从自己意愿的“左派”，而反感逆鳞犯上的“右派”。但是，恰恰是子路、子贡那样的直言不讳的“右派”，有助于儒学改革进步，而颜回这样迎合上意的“左派”，则只会让孔子和儒学留下遗憾。

孔子自己是当时主旋律的“右派”思想家，但在采集学生意见时，却又喜爱和鼓励看齐老师的“左派”。可见人性中有一大悖论，人自己愿意做“右派”，却又喜爱“左派”下属。

几千年来朝朝代代皆有形形色色的“反右运动”，其根子，在于人性的这一深刻悖论。

不过，孔夫子虽然难逃这一人性悖论，却因为坚守了一条“共生底线”，并没有在团队中开展“反右运动”——没有因为子路、子贡这次犯上傲上而将其入另册戴帽子，而依然对他们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晚年“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表现出对子贡的深切情意。子路在卫国讨贼战死时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讯，即将家中的肉酱全部倒掉。可见对子路情谊之深。

可惜后世君王们皆失孔子与左右共生的底线，以至于有了史无前例的 1957 反右运动和 1966 文革动乱。

今日学者们只知驳司马迁史料不可靠：“以上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三段对答《左传》、《论语》皆不载。崔述曰：‘陈蔡之围经未有言者，独《庄子》书数数言之。后人相传之言盖本于此，不知庄子特讥孔子好言礼义又自困其身，其言既皆寓言，则其事亦安得以遂以为事实也？《世家》、《家语》之文采之《庄》、《列》者半，当其在《庄》、《列》也，犹有一二人以为异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语》也，则虽名儒（马迁）亦信之也。’”（《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著，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 2010 年 6 月版，P3801）

却没想想，司马迁乃大智、仁、勇三德俱全之史学大师，为何要在千古绝唱《史记》中编造孔子“反右”“支左”的故事，让《史记》留下美中不足？

从《孔子世家》对颜回的逢迎孔子的淋漓尽致描写，可见司马迁深恶儒者“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这就让人猜想，《史记》编造孔子“反右”，可能是司马迁预料今后的帝王们必然会不断以种种残酷方式打击傲上的清流右派，故特意制造一个“孔子反右方法”——虽然不喜欢直

言真相的右派，却也仅仅止于当面诡辩与批评，绝不采取暴力报复或“组织处理”。事实证明，这种温良恭俭让的“驳右”不反右的共生方式，让孔子与弟子们始终团结，让儒学不断发扬光大，以至孔子去世 107 年后出了个倡导“民贵君轻”的儒家大右派孟子（前 372 年 – 前 289 年），被尊为亚圣。

不过司马迁没有想到，他如此苦心撰写的《孔子世家》，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读懂。以至于 2007 年，有个叫易中天的厦门大学教授，还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大讲：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的三段著名“反右”对答，以此提醒人主“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易中天明知《史记·孔子世家》这段“孔子驳右”于史无据，却仍然继承司马迁遗愿，脩旧起废，继续将子虚乌有的“孔子批右”说得活灵活现，即使在 2019 年的微信群中也依然广为传播。这真是“小子何敢让焉”这可贵！

可惜，如此精彩的孔子“反右”“支左”故事，却只存在于《史记》，而不见于《史记》之前的古籍中！

秦晖的“右派”新论

如果说，“反右”研究四十年来，资料累积、数据规模最大的要数武宜三 2019 年竣工的《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那么秦晖的“右派”新论，可能是关于“右派”标准的最新讨论。

秦晖对“新右派”处境的关注（秦晖自称为“我正是同时在这两条战线参加‘主义之争’的”），大约始于 1994 年——“我们也开始了对‘新左派’的批判，1994 年在《东方》杂志上对甘阳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1995 年在《二十一世纪》对崔之元的一些观点提出一系列的批评。”（《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5）1995 年，国内传统左派以‘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反右反改革，秦晖更全神贯注于 1997 年以来大陆流行的“自由派”（“新右派”）PK“新左派”。秦晖 2006 年热传于网络的《在现代文明的共有平台上》，考证出“右派”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一般历史书上说左右这对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国民公会议员中主张激进变革的坐左边，保守的或不那么激进的坐右边，于是就有了‘左派’‘右派’的区别：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

这一“右派”是现代化产物的观念，在其 2013 年 3 月问世的新著《共同的底线》中，有了更细致更广阔的归纳。所谓“共同的底线”，是指左右两派可以寻求“反强制”等一些基本共识，以便求同存异合力推进现代化。

秦晖的“右派”新论大约有 16 种——

1、在“文明冲突”中产生的“右派”——积极推进西化者：

“早在‘五四’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 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文化热’中的‘中西’之争再度热闹起来，80 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90 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可谓高潮迭起。”（《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

虽然此处秦晖没有明说，但读者多明白，“文明冲突”中产生的“右派”，是指“80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

2、在“主义之争”中产生的“右派”——“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还乡了：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开始了‘主义’之争，50年代以前国内的‘左右’热战血流漂杵，5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资社’冷战剑拔弩张。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化，‘主义’之争却脱去文化的包装再度‘浮出水面’。”（同上）

这表明，1957年的划“右派”标准和背景又还乡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将有可能“再度‘浮出水面’”。持“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将是新右派。

3、在“现代性背景”的“三争”下产生的“右派”——号称“第三部门”的“古典自由倾向”者可称“新右派”：

“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呼声中，自治和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也发展起来，它与民族国家－政府组织（‘第一部门’）本是各司其职的。但许多发达社会本具有扩大‘福利国家’以压缩市场领域的社会民主倾向，和扩展市场秩序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自由倾向，以及这两者长期对峙的传统……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PII）

这一节表明，号称“第三部门”和“扩展市场秩序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自由倾向”者，可称“新右派”。

4、在“共同底线”下产生的“右派”——反对原教旨神权专制者是“右派”：

“根据这些原则，基督教、儒家理念与伊斯兰教应当和平共存。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则必须战胜异端审判，这两者是没有共存之说的。……因此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PIII）

5、在“社会契约之争”中产生的“右派”——真想建立“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者是右派：

“又如在‘左右之争’中，发达国家的传统话题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他们的左派主张扩大国家承担的责任，而右派强调要限制国家的权力。这两者形成对立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有了一个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在这种契约下，国家的权力与契约严格对应：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并对公民负责，公民需要国家承担多大责任，就授予它多大权力——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国家。”（《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

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IV)

秦晖在这里让老右派们极其悲伤：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时，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的右派呢？

6、在“三个部门之争”中产生的“右派”——反对“以强制求私益”者为右派：

“没有‘权力只能用于公益’的现代民主国家和‘私益只能出自自愿交易’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的第一、第二部门就都还说不上形成，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以自愿求公益’的第三部门。而摆脱‘以强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权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这正是三个‘部门’所共同需要以之为前提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IV)

7、在“伪社会主义”与“伪自由主义”之争中产生的“右派”——主张“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的反对“伪现代化者”是右派：

“当年为了在（美国）南方实现北方式的自由，社会主义者魏德迈在马克思的赞许下加入林肯政府的联邦军当了军区司令。……魏德迈这样做既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他走向了‘第三条道路’。如果魏德迈在南北战争中保持中立，甚至与南方奴隶主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北方，那他当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但他还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吗？不幸的是，如今在我们这里，亲‘南方奴隶主’的‘伪社会主义’者与‘伪自由主义’者都不少。”（《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VI)

8、在“民主社会主义”与“人道的资本主义”之争中产生的“右派”——“社会自由主义”者成为“右派”：

“当年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得它的敌人也装扮成社会主义者。而今，社会主义的失败使得它的信徒也装扮成非社会主义者了，在大潮的冲击下，国家易帜党改名，‘连累’所及，西德社民党也宣布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改为‘社会民主主义’以避嫌，而波兰社民党干脆只讲‘人道的资本主义’而不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发表声明，对于‘前共产党’一窝蜂地向自己认同表示怀疑，而这个国际的内部则有人倡‘社会自由主义’之说，因为‘民主社会主义’也臭了……以至于有人说，今日只有教皇还敢讲同情社会主义的话而不被斥为可耻之言。”（《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02)

9、在质疑“有商会而无工会”中产生的“右派”——“老左派”成为了“新右派”：

“今天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的麻烦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复兴，比资本主义更肮脏的现象之存在更不值得社会主义者高兴……我们过去自称拥有‘最高形式’的民主而嘲笑西方民主的虚假，如今却在说：民主只能循序渐进，

‘民主不能饭吃’，我们是穷国，不能享用‘发达国家的人权标准’。我们过去自称虽不富裕但社会主义保障了基本福利，如今却在说西方福利社会那一套我们搞不起……我们过去自夸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而如今‘有商会而无工会’却成了我们招徕外资的一张王牌，并公然宣传外商要求设立党支部以便管束工人。我们过去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今却把反制裁的宝全押在见利忘义的大资本家身上，而把西方的工会视为头号敌人……我们今天越来越依靠‘亚洲价值’、‘文化传统’、‘特殊国情’和民族主义，而不是靠‘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响应西方的挑战……面对社会主义不是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就是转向专制资本主义的大潮，有的人自我解嘲似的宣称。社会主义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了，却在资本主义世界胜利了。”（《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P103）

10、在质疑“自信”的人群中寻找“右派”——怀疑“理性的自负”者自然是难以响应“几个自信”的“右派”：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起源于‘理性的自负’……其实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同样起源于‘德性的自负’。德性与理性其实都是人类的天性，对此过于自信当然是致命的……哈耶克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P106）

11、在“消极自由主义”的人群中寻找“右派”——谁叫好“消极自由主义”谁就是“右派”：

“历史上所谓‘消极自由主义’（或译‘否定的自由主义’）者总是假定，人们本来就是自由的（假使先设定一种关于自由的‘自然状态’），只是后来陷入了‘致命的自负’，着迷于构建一种想入非非十全十美的‘理想制度’，才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作为社会主义里程碑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积极自由’理念的集大成者。”（《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P106、108）

12、在“反强制”的人群中寻找“右派”——“反强制”虽然比“反专制”温柔一点，但仍然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暴力”的“右派”：

“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乌托邦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可以实现的理想’同样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否则，如果一个人可以‘理想’为理由不受制约地强制他人服从于己，那就会为借‘理想’之名而营私者大开绿灯，到头来也摧毁了‘理想’本身……‘消极自由主义’不认为人类有可能建立‘理想秩序’，马克思则认为可能，并把这种秩序描绘为‘自由人联合体’。150年过去了，人类并未看到这类联合体。于是相信‘消极自由主义’的人多了起来……强制性的确是苏联式制度的突出特征……苏式制度的正统理论家认为，‘现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而暴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并否定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社会发展形态决定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如今太没有说服力了。因为人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至今没有一个出现了‘社会主义’，而‘社

会主义’国家除了从外部强加的（如苏军占领下的东德、捷克）以外，都是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农民国家里建立的。”（《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11、114）

13、在“不公正的伪竞争”中寻找“右派”——具有强制色彩的列宁主义必然源源不断产生“右派”：

“‘社会主义’既不源于资本主义，也不源于理性主义，而是源于不公正的所谓竞争，源于扭曲竞争的封建传统。‘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不公正的伪竞争，就没反竞争的伪公正……不仅近代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封建遗产扭曲下的不公平竞争有关，而且在社会主义内部，具有自由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具有强制色彩的列宁主义，这两大分支的兴衰也与‘不公正的伪竞争’有关。”（《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16）

14、在“许多‘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的论战中寻找“右派”——“许多‘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批判的对象必定“与右派只有五十步了”：

“如今的许多‘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他们的‘头脑’与‘良知’并没有问题，也富于创新精神，然而他们创新的方向已经很难说是人文主义的科学化与科学主义的人道化。”（《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27）

15、在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稀缺时期寻找“右派”——中国苏区大杀‘社会民主党’的大肃反就是 1957 年反右运动的前奏：

“在中国近代史上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比自由主义传统更稀缺。在民国时期，社会民主诉求通常是由自由主义者表达的，而‘左派’则具有渊源于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和俄国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传统双重影响的强大的警察民粹派传统。这种传统对于社会民主思想的摧残，可以说比任何‘右派’都厉害。只要想想斯大林当年关于社会民主党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话，和中国苏区大杀‘社会民主党’的大肃反，就不难相见了。直到如今，缺少社会民主主义成分仍然是中国‘左派’包括所谓‘新左派’或‘自由左派’在内的一大弊病。”（《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8）

16、在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中寻找“右派”——反威权主义者为“右派”。

“当今中国的思想分化，一方面并未摆脱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大格局，另一方面又在‘斯托雷平改革综合症’的背景下，出现了寡头主义对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歪曲，和警察民粹主义对‘自由左翼’思潮的控制。于是，从寡头主义立场对社会民主主义（乃至对自由主义本身）的压抑——那个公然宣传剥夺劳动者有理的‘公益广告’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堪称代表’——以及警察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乃至对社会民主主义本身）的压抑——那种呼唤改革

前警察体制的‘再度文革’派堪称代表——都发展起来。”（《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6）

“新反右”已经开始

如果有人要问，《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的问世，除了具有史料积累价值，还有没有什么现实针对性？当然有！因为新时代的“新反右”，早已开始，并且将掀起高潮。

秦晖《共同的底线》中有篇《“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此文可见“新反右”——“许多‘西马’、‘新马’和‘新左派’（新左翼）”至少在 1996 年开始，就对“新右派”（自由化者）们开始围剿了——1996 年 4 月号《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崔之元批秦晖的文章《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

细读秦晖“再问崔之元”，可见“新反右”11 种招式——

1、 指责“新右派”们是“混淆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的“新的思想僵化者”，“新僵化”成为“新右派”的新代号：

“拜读了崔先生答拙文《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之大作，颇有感想……纵观全文，崔先生对我（以及对一般他所指的‘新的思想僵化者’）的批评集中于一点，即‘混淆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崔先生善用新词，他这硬译的‘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一对术语，实际即国人习称之‘全盘否定’与‘部分否定’。”（《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89）

此处揭秘了“新左派”一个重要特色：“善用新词”，爱“硬译”新学说。

2、 指责“新右派”们对毛泽东时代持“内部否定”（全盘否定），因此“成为一种新的僵化”——凡质疑毛泽东时代者皆是“新僵化”（“新右派”）：

“崔先生自认为他对毛泽东时代的旧体制持前一态度（‘外部否定’），而后一态度则‘成为一种新的僵化’……从崔先生以往的论述可知，他并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是‘苏联式国家’。”（《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89、190）

3、 指责“新右派”们对“大跃进”持“内部否定”（全盘否定），“新右派”们皆有“稻草人谬误”：

“对于‘大跃进’之类造成几千万饿殍的灾难，崔先生自认为是给予了‘外部否定’（‘部分否定’）的，所以他对我的批评很不满，以为我在‘攻击稻草人’。”

（《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91）

所谓“攻击稻草人”，即“稻草人谬误”，指论辩中有意或无意地歪曲理解论敌的立场以便能够更容易地战胜论敌。

4、 指责“新右派”们对“圣上”不“内部肯定”：

“崔之元先生的‘外部否定’原来是褒贬分明的：‘臣下’与‘君侧’都受到了‘内部

否定’，而‘圣上’却是永远享有‘内部肯定’的。这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么？”

5、 指责“新右派”们没有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分法”：

“崔先生力主‘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分法’，在，是墨索里尼当时就宣称建立了‘既反对社会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崔先生要在一党专制下探索‘权威主义与西方民主之外的选择’，而希特勒也要在一党制下建立‘既不是议会民主制、也不是君主制的人民国家’，实现超越‘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全体人民的专政’，或曰议会制与苏维埃制以外的‘日尔曼民主’。崔先生主张传统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新经济制度，而纳粹的经济体制恰恰‘既不是苏联模式的中央化的全面计划，也不是与西方类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而是‘部分的计划和继续利用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干预手段’的经济。崔先生推崇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两参一改三结合’，而法西斯党党章中就规定‘工人参加工厂企业的管理’……”（《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93）

6、 指责“新右派”们不懂“黑暗”来自执行者而非“圣上原意”：

“（崔先生等）把生活中的种种黑暗都说成是‘在执行中’与纸上写的‘原意出入极大’来为之开脱，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94）

7、 指责“新右派”们不懂“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的老祖宗是美国资本家：

“在崔先生笔下，美国老板福特是‘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的老祖宗，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型国企鞍钢则成了‘市场竞争内在逻辑’的发祥地。这真是‘眼睛一眨，母鸡变鸭’。”（《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96）

8、 威胁“新右派”：咱们“新左派”是既被国内‘领导层’看好，又‘受海外学界赏识’的“奉旨讨逆”：

“崔先生的同仁在我之前早就以‘新左派’作为他们这‘一群研究中国改革前途的海外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诩之词。远的不说，《明报月刊》1996 年 1 月号刊出一组‘新左翼’文章专辑，打头的何秀怡一篇总叙似文字，就大谈‘新左翼’如何不同于‘老左派’的‘空洞、简单和教条化’，如何‘主张制度创新’，既切中时弊又富于学理，‘承袭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因而既被国内‘领导层’看好，又‘受海外学界赏识’；……领导层对崔先生他们很欣赏，‘他们在国内学刊发表意见亦比较自由。’”（《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99、200）

9、 警告“新右派”（自由派）：你们已“言论和活动都备受控制”：

“按何秀怡的说法，这些‘自由派’言论和活动都备受控制，缺乏表达的自由，‘遭受较明显的压制’，‘研究活动遭受卡控’。”（《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201）

10、控告“新右派”乃一切灾难的根源：

“从1995年起，国内传统左派也加大了抨击改革（包括‘新右派’）的力度，著名的‘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就是代表作……总之，一切灾难都是由于‘民间’的自由太多，统治者权力太小。这也就是我国古代专制者所说的：‘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而一切祸端皆缘于‘阡陌闾巷之贱人……’”（《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P207）

11、向“新右派”们宣布为“文革”平反：

“因此，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极大的不同。……中国90年代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人所倡导的‘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中。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非常强调从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人民公社’被他们认为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被他们认为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块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很大的不同……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国人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距离……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2018年9月第6次印刷，P18）

秦晖的“新右派”生存共生术

近六七年来，言路的逼仄可谓史无前例。但秦晖集新老右派之大成的专著《共同的底线》（35万字），却能在2013年3月出版后，又在2018年9月第6次印刷，创造了大陆极右言论生存与畅销的奇迹。

其中奥妙何在？书名《共同的底线》就透露了天机：秦晖追求的“共同的底线”，实际上暗藏一种左右多元共生智慧。比如，书中多以“强制”代替“专制”，以“共同体”代替“政府”或“党国”，以“农民学”代替“农民苦难”，以“改革前体制”代替“毛泽东时代”，以“寡头主义”代称“资本垄断、政治独裁的极权主义”、“一把手腐败”，以“民粹主义”代称“爱国主义”、“群众路线”，以“不公正分家”代称“制度腐败”，以“问题情境”代称“政府腐败”，以“俄国”、“沙俄”代称“中国”，以“大家长”代称“大领导”，以“复兴”代称“复辟”，以“大家庭”代称“中华民族”，以“命令经济”代称“中国特色”，以“卖方”代称公民，以“掌勺者”代称“贪官”等等，这诸多代称，就绕过网警的检查敏感词设置。而在重大思绪的表述上，秦晖更处处展示了宽容的共生智慧。

从秦晖文中可见当今“新右派”共生术10招——

1、批左的焦点，往往是新老左皆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国目前那些既为哈耶克（消极自由主义）的理念所不容，也为马克思（积极自由主义）的理念所不容的事难道少吗？在沙皇俄国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美国式道路’，而自由派自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两者的冲突日益尖锐而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风却愈刮愈烈。终于在一场植根于‘不公正分家’的社会大动荡中，导致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同归于尽。而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却以最极端的形式结合为一，并把俄国带入了漫漫彻夜之中。”（《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8）

2、以“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艺术说“沙俄”：

“而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情境’实与自由秩序建立前的沙俄更为近似……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主义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9）

3、以“重合”求共生，分割马克思与斯大林而分而治之：

“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所谓‘第三条道路’呢？也许是的，但也许这是‘第一、二条道路的重合’（而不是两条道路之间，更不是两道路之外）更准确。无论如何，中国目前的问题既不是‘自由太多妨碍了平等’，也不是‘平等太多妨碍了自由’，因此我们只能追求更多的自由同时也有更多的平等的‘第三条道路’，而不能追求那既不自由也无平等的‘第三条道路’，甚至也不追求那‘半自由半平等’或‘折中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希特勒当年曾宣称要搞一种超越‘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这就是那种既不自由也无平等的‘第三条道路’之例，我们当然不能学……而只能是重合了自由与社会民主二者之基本价值的道路……而在我们这里，在为上述基本价值而奋斗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有只有两种立场，哈耶克与马克思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立场。”（《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0）

“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价值是可以重合起来的，甚至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和原则也是可以重合的。”（《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7）

4、以“双反”求共生，追求“自由（共生）优先于主义”：

“在我们这里，只反对‘自由右派’的人或把‘自由右派’当作头号敌人的人决不是什么‘自由左派’，而是（用沙俄时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话说）‘警察民粹派’。另一方面，只反对‘自由左派’或只反对社会民主原则的人也不是什么‘自由右派’，而是‘警察寡头派’。……因此在‘主义’问题上，我只能持自由 - 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用我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即‘自由优先于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如在

西方可能会显得十分‘中庸’：它似乎不左不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亦左亦右，但在中国它却是一种‘激进的中庸’——在经济上，它既不利于大家长保卫或复兴大家庭（如某些‘左派’所赞成的），也不利于大家长独占家产而把子弟们踢出家门（如某些‘右派’所赞成的）。在政治上，它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而愿意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1）

5、以“公正自由优先于繁荣富强”为核心价值，远离“主旋律价值观”：

“主旋律价值观”24 字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但秦晖倡导“公正、自由、民主、人道、繁荣富强”的共生价值观：

“我以为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因而历史可以解释），但由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历史中的因果只能是概率性的因果，而不是必然性因果。由于任何不为 1 的概率之多次乘积只能趋近于零，因而从长远看人们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例如。若事件 A 导致事件 B 的概率为 80%，事件 B 导致事件 C 的概率为 60%，事件 C 导致事件 D 概率 70%，那么事件 A 导致事件 D 的概率仅为 33%。因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所以明天的中国搞不好，那不能怪孔夫子，也不能怪马克思，而只能怪我们自己，我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会有成果的……力图在农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既超越‘俄式社会主义’，也超越‘亚洲式资本主义’，而寻求一种公正、自由、民主、人道、繁荣富强的发展方式。”（《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12）

6、从“共同底线”走向共生：

“如今中国的‘问题’所呼唤的‘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激进的中间派’立场。但在中国，这种立场与其说是‘第三条道路’，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条道路的重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7）

“而我们这里的寡头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都违反了这一共同底线。相反他们却有着另一个共同基础：当年那个以反自由的方式的‘化私为公’的民粹主义权力，也就是今天以反民主的方式‘化公为私’的寡头主义权力。当年它可以对公民私有财产乃至一切私生活领域实行‘公共选择’，如今它又可以对公共经济资源、公有资产和其他公共领域大搞‘双方交易’。”（《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7）

“在如今的中国，在自由主义旗号下主张寡头主义（朱按：资本垄断或政治独裁）的人是有的，而且似乎还不少。但正是坚持共同底线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所谓的‘新左派’）对此进行了最早最坚决的抨击，他们主张公正至上，反对原始积累与权贵私有化，支持‘获得正义、交易正义和矫正正义’基础上公平竞争

的市场经济，强调通过民主化来解决产权改革中‘卖方缺位’和‘看守者交易’问题，以遏制‘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抢来本钱做买卖’的行为，在起点公平与规则公平原则下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8）

7、以“激进的中派”为共生前沿基地：

“这种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共同底线的‘激进的中派’立场，也根本不同于介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调和与中庸立场。‘激进的中派’体现了作为现代公民取向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反对前近代传统与专制桎梏的立场，没有这种立场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寡头主义而非自由主义（连‘自由主义右派’也算不上），没有这种立场的‘左派’实际上是警察民粹主义而非‘新左派’（连‘老左派’即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者也算不上）。因此我们说它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3）

8、以“分开走，一起打”促进共生：

“实际上，共同底线的立场，亦即反专制、争自由的‘激进中派’立场，在历史上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基础，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宗师普诺汉列夫的话说，那时这两者的关系是‘分开走，一起打’。”（《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54）

9、“同化”也是一条共生曲径：

“作为政党的自由党虽然衰落，它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传统却逐渐‘同化’了其右边的保守主义与左边的社会主义，使得先是保守党、后是工党都出现了自由主义化的进程。这种‘自由主义组织缺乏生命力，自由主义的价值极富生命力’的现象（不仅英国为然）很耐人寻味……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剩下的问题是，应当在什么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48）

10、以博弈抵制强制追求共生：

“一个理念变为实际操作，都意味着一个博弈过程，博弈过程就是各种利益的均衡……我们的一条底线，你不能违反诺齐克的、实际上也是人们凭常识都能认同的那些最基本的正义标准。我多次说，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国家禁止公有制……强制是万恶之源。”（《共同的底线》，秦晖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201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P41、43）

于真“右派个案”的共生梦

于真履历两个版本

1957 年中共武钢干部总支对于真的大批判

2006 年于真吁请中共接受“共生论”

通过《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可以检索湖北人于真先生九十年的“右派”命运：于真七十岁后，有一个大转折——先前认为“反右运动”主要是元首犯了“阳谋专制病”，但离休十年后的潜心研究却发现，“反右运动”的根源主要是“主义”病了，应当将“共产主义”更新升级为共生主义。共产必然要暴力夺取“阶级敌人”之财产，自然只许革命“左派”生，不准资产阶级“右派”活。若是有了“共生论”，就可以“共生前提”限制“左派”的“自由专制病”。可见，许多老“右派”早已在响应秦晖从“共同底线”走向共生、以博弈抵制强制追求共生的呼吁——2011 年 4 月在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万字专著《共生论》，系统表达了以“共生哲学”改革中国的梦想。

于真原名，王肇仁，其履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1957 年 8 月 20 日中共武钢干部总支在大批判文章中公布的——

“于真（王肇仁）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其祖父‘读书乐’、‘读书高’的教育，其叔、伯、舅都在国民党时期高居官位。其堂叔父王继业曾任过三青团江西黎川书记，浙江嘉兴青年军校事务处长，伪安东省田赋处长，是少将衔，曾供给他求学费用。他族伯父任过伪萍乡煤矿局长，他父亲还借此关系到萍乡任过督察主任和堆栈主任。这一切对他的影响是向上爬，作高官，名扬天下。其舅父於润华，桂系失意政客，1926 年任过武汉市财政局长，不久以后任过伪湖北省任过教授，现在退休，是民革成员。是和他一道研究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代表监察制度’的一分子。于真受了他不少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解放后仍住在萍乡，1952 年‘三反’‘五反’时期，要求迁到武汉来住，当地公安机关因其历史复杂，没有批准，在不久以后因病落在江里死了。于真因此对政府机关极为不满，认为其父的死是由于公安机关不准迁出而死的。1954 年他从军队转建后，还到萍乡质问公安机关，以后他一直是怀有阶级仇恨的。”

另一个见于真 2011 年 4 月在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万字专著《共生论》扉页——

“于真，汉族，原名王肇仁，1929 年 11 月 3 日生于湖北省黄梅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离休干部、社会学研究员。1947 年在华中大学经济系肄业，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任参谋。1954 年转业武汉钢铁公司干部学院任教员。（1957 年底打成‘右派’后，下放湖北省黄陂县鲁台乡前川蔬菜公社劳改一年，后到武钢当建筑工人，1974 年成‘摘帽右派’，1979 年彻底‘改正’。）改革开放后，曾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顾问，并任省高校保卫工作研究学会顾问、武汉市公安局犯罪问题研究常年顾问、省社会学学会副理事长、顾问等学术职务。社会学恢复后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著述、主编有《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状况》、《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科

学方法与技术》、《调查研究知识手册》、《社会机制论》……2005年，发表‘共生千字文’，首倡共生理性，希冀圆人类共生共生之梦。”2018年11月，于真又在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五十万字的《于真文存》。

综合这两份“于真简介”，可知于真是出身耕读之家，受过高等教育、因打成“右派”劳改22年的“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晚年从共产梦者转型成为“共生主义者”。

1957年中共武钢干部总支对于真的大批判

于真为何要从共产梦者转型成为“共生梦”？不妨读读1957年8月的武钢“反右运动”对他的一篇大批判《于真是怎样向我们监察制度进攻的？》，这篇5,400多字的大批判中，中共武钢干部总支以于真社会关系复杂，甚佩大右派，对党怀有父亲死于不能从乡村定居武汉之仇为逻辑，认定于真是“打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研究’监察工作”反党，由此引蛇出洞，将于真斥为“右派”。请看历史文件——

于真是怎样向我们监察制度进攻的？

武汉钢铁公司干部学校语文教员，挂着共青团员招牌的于真，打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研究”监察工作已半年余。从1956年10月开始，到1957年1月间，就写成了所谓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的“人民代表监察制度”。这个“制度”的制定，还有语文教员，民盟盟员周鸿庆和他舅父於润华（民革会员）参加。

（朱健国注：据于真堂妹王余保2019年2月9日13时许说：“反右运动”前于真本来很左，1957年本来是以积极建言“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帮助党整风表忠心，却不料忠而见疑，反被打成右派。这样说来，“反右运动”堪称让人们真正认识执政者的清醒剂。）

在他的这个“制度”写成以后，于真曾洋洋自得的声称：“我已制订了彻底消灭官僚主义的最好办法，给官僚主义撒下了天罗地网，使官僚主义处处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无可隐蔽。”二月间就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写了“建议书”，和这个“制度”一起寄给了刘少奇同志。2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回了信，说已将他们的“建议”“留作参考”。于真接到信后很不满意的说：“没有具体回答这才是官僚主义！”这时也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一份，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回信说，他寄去的“建议”及“制度”“均已收到”。他便生气地说：“这比人大常委官僚主义更严重！”原因就是没马上采纳他的建议，没有“具体答复”。

在此以后，他们便到处推销他们的货色，以周鸿庆民盟盟员的身份寄给罗隆基，以於润华民革身份寄给民革中央，6月间又通过於润华向湖北省政协政法研究组胡忠民介绍，曾约定于6月下旬请于真去做报告，但因故未成。他的“建议”“制度”共印20余份，除送往许多机关外，还到处以“请教”、“征求意见”的名义给许多教员看，散布毒素。使不少人被他的“忠于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等好听的名词所迷惑。大鸣大放时期，还寄给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要求发表。总之，为了实现他这个制度，想尽了一切办法，企图争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

“群众”的支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于真便写信给武汉右派分子马哲民，要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人大常委和民盟中央促其制度实现。马哲学6月14日回信说，对他的“制度”“甚佩”，“当代达罗隆基先生，共同研究”。（朱健国注：于真关于将从上到下监察的制度改革为上下皆可主动监督的建议，本找不出什么“反党”的证据，但有了他与全国大右派罗隆基和湖北省的大右派马哲民联系过的证据，就有了定于真为“右派”的关键依据。这种奇怪逻辑，不仅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极为盛行，就是今日也仍然是一种搞专案的潜规则。）

他的“制度”写好后，学校团支部很多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论点，对他展开了多次批评，并在三月份就准备组织讨论。于真当时的意见是暂不讨论，看看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后再说。以后周鸿庆又不同意讨论，一直拉到现在。在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中，开始了对于真“制度”的讨论。为了彻底明辨是非，大家掌握了说理原则，组织了辩论。

（1957年）7月24日邀请于真向全校教职员对他的“制度”的论点作了发言。于真当时的神色是十分疯狂的，目中无人，蔑视群众，谈笑风生，哼哼咳咳，极不严肃。他为他的“制度”作了许多辩解，说成了是“以主人翁的态度”，“为社会主义设想”的东西，要大家辩论，并说：“讨论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会后他还同周鸿庆说“要和保卫生命一样来保卫”他的制度。同时再三声明，这是“学术研究”，不要联系思想问题。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做贼心虚，难道制度改变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吗？难道一个野心家制定的“制度”，没有他的思想根源而偶然发生吗？（朱健国注：这一节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引蛇出洞——“（1957年）7月24日邀请于真向全校教职员对他的‘制度’的论点作了发言”——明明不喜欢于真的“监察制度”建议，却故意让他向全校教职员对他的‘制度’的论点作了发言。）

到底于真的“制度”是什么货色呢？为什么博得右派分子马哲民的甚佩呢？经过大家的辩论与揭发，已经真相大白了。原来于真的葫芦里充满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毒素！

首先看看他制定这个制度的动机。他说，他制定这个制度是为了消灭“官僚主义”的。那么他所说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呢？这里可简单地举几个例子：学校行政科长对他住房子问题没有使他满意，他说是“官僚主义”；教育科长在教学计划问题上，没有接受他无根据的压缩时间的意见，是“官僚主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回信说他的制度已留作参考，就是“官僚主义”；湖北省委回信说他的“建议”和“制度”均已收到，就是“更严重官僚主义”了！这样一来，就是“天下莫不官僚主义”了。原来一切不合他的心意的事情都是“官僚主义”，都应该“消灭”。他所说的“官僚主义”，难道和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有共同之点吗？他曾声称：“我死了，如果在我的坟上写上‘官僚主义的死敌’几个大字，我死也瞑目”，他说，他是强调个性自由的，于真一直是把不符合他的“个性自由”的党和上级领导看作“官僚主义”的。我们知道，这种反党、反人民的“个性自由”，人民

是不会给的。于真所要的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于真所说的“官僚主义”，正是人民民主专政，正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假若实行了于真的“制度”，消灭了于真所说的“官僚主义”，全国人民所珍惜的社会主义就会完蛋，资产阶级自由就会泛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复辟，全国人民就会再度陷入被奴役的地位。于真曾经说过：“如果实现了我这个制度，就没有人再愿意当科长了”。因为科长就是“官僚主义”吗？就“处处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无可隐蔽，知难而退”，被“消灭”吗？自然于真所说的不仅是“科长”，而是一切“长”。谁都知道，没有了这些“长”，就瓦解了国家机器，我们还用什么去专政呢？用什么去建设社会主义呢？于真不要这些“长”，正是为了不要社会主义的。

于真在他的建议书中完全否定了我们现行的国家监察制度和监察工作成就，他污蔑说，现在的监察机关“只是一个消极坐待检举、控告的机关，有时连这种现成的检举、控告，也不能作出及时、有效的处理”，“用之于自上而下的检举即可，用之于自下而上的监察，则无能为力。”是“不建立于群众基础之上而附属于行政机关之内，其作用必须以人为转移”。“这就是这种监察制度的致命缺陷”。难道我们的现行监察制度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吗？就是这样无用和糟糕吗？于真能举出什么“糟糕”的事实来呢？我们国家机关干部之廉洁，在历史上空前的，和旧社会贪官污吏遍地皆是相比，这一点难道还有人怀疑吗？这些奇迹，除了党的教育之外，也是和我们监察工作的成绩分不开的。我们的监察工作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群众是热烈拥护，积极参加的。我们的监察工作是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巩固的群众基础的，虽然还有缺点，还需不断改进，但成绩是基本的。于真这样凭空污蔑，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于是在他的“人民代表监察制度”中，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如他的制度的第四条说，工厂、企业、学校、机关都应在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基础上“选出该单位的监察委员或监察组（有人民代表的单位以人民代表为核心组成），向职工代表大会负责……而职工代表就是该单位的监察员……这些由职工代表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在企业、学校、机关中的监察细胞”。按照他的规定在工厂、企业、学校、机关都建立监察机关，而且都是独立的，垂直中央的，完全否认了党在基层组织的统一领导。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我们正在许多企业单位试行，但这和于真所说的职工代表大会监察委员会根本不同，这是在党领导下的民主管理机关。党在基层监察机关的领导，他规定只能“支持在监察工作中的党员带头向行政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展开批评，以保证党在监察工作中的领导和威望”。难道党仅仅支持这种批评，就能保证党的“领导和威望”吗？他又规定，这种监察委员会要做到行政负责人不同时兼任监察委员，以维护监察工作不受行政力量的影响。他还说过：“党的领导是通过在监察委员会中当选的党员来体现”，“可以争取 60%以上的党员当选”。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基层组织比例要小，再除去行政负责人员不能兼任，能有 60%的党员当选吗？纵然多数党员当选了，就能代替党委的政治领导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实行了于真设计的“制度”，势必把我们的基层组织搞

垮，造成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状态，破坏了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造成天下大乱。

官僚主义是旧的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已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了，在旧的制度下，是属于制度问题，在新的制度下，已不再是制度问题了，只有我们的制度给克服官僚主义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克服官僚主义必须经常用整风、学习等方法，坚持长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只有对造成严重损失的官僚主义者，或屡教不改者，才给以应得的纪律处分或法律制裁。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目的的。但于真却坚持说现在官僚主义不能很快克服仍是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找根源，要改变制度，要对“官僚主义”一律用监察的方法。但是像他这样改来改去，只能改成资本主义制度，还不是很明显吗？

按照于真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为各该级人民监察员，负责本选区或选举单位的监察工作。人民群众或下级工作人员对行政机关提出意见不被重视时，‘就可以找自己的代表。各级监察委员会提出都无效时，则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之监察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他特别把监察委员说成是群众“自己的”代表。那末政府（行政领导）就不是群众自己的了？他有意识的把群众和政府（行政领导）对立起来。他主张“意见”不分大小和是否必要，都一律经过各级监委提出，直到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委向国务院提出，这不是一定要这种“监委”和政府唱对台戏吗？为什么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不能直接向有关单位提呢？同时，如果实行了他的办法，也势必瓦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宪法规定是集体行使职权的权力机关，强调了个人监察作用，就会造成人民代表大会的分裂状态，甚至会破坏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里，他还恶毒的攻击、污蔑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说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提修修马路，改善改事卫生的意见”，“比干部会议还不如”。是“流于形式”，只有实行了他的办法，才能改变这种现象，而他的“制度”则是“不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国家，是不能实现的”，有了他这个“制度”，群众才会“感到自己不是孤立无援”。那末，我们不实行他的“制度”，就不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了！不实行他的“制度”，群众就都是“孤立无援”了！他说，只有他的制度才能保证群众“有恃无恐”的向领导批评，试问这种“有恃无恐”会造成什么效果呢？于真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思想是多么露骨啊！

在大鸣大放期间，于真到处散布反动言论。他说：“知识分子不是主人翁，要是主人也是二等主人”，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说“思想改造问题越改造越多”，说“少先队是培养小宗派，非取消不可”，他还利用语文教员兼班主任的职权，企图在文化十班“点火”，他私自在班内出“我们学校的矛盾”的作文题，动员同学写学校存在的矛盾，并说可以用夸张、讽刺、对比、形象等写文章的笔法来发挥。同学们有顾虑时，他就鼓励说：“你们大胆写吧，我负责保守秘密”。事后还要支部动员几篇“好稿子”，作为墙报出刊，被支部拒绝了。他还把有关学校领导的“缺点”的材料，摘在自己日记本上，准备鸣放时提意见。反右

派斗争，他思想抵触，抱消极态度。开始时，他说：“土改是消灭地主，社会主义改造是改造资本家，这次当然是整民主党派”，挑拨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于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是和他一贯的反领导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于真1954年从部队转业前，在训练团学习时，就曾为了个人目的拉笼小集团，反对领导，并不惜鼓动转建军人不参加修堤，破坏防汛，并随声说：“国民党有个上饶集中营，共产党有个王家院子”，把训练团和上饶集中营相提并论，散布反党情绪。于真在武钢干校三年来，也是一贯敌视领导，自高自大，经常给领导干部为难，破坏领导威信。他一贯在教研组内飞扬跋扈，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教师无根据地说教育科的领导是官僚主义的总代表，如果把他所掌握的材料揭出来的话，领导上就见不得人了。他很不尊重领导的意图，经常在会上故意发表与领导不一致的意见。如有一次要搞作文竞赛，领导上说可以把读过的文章来一个缩写，他偏要叫写一篇《我们的学校》的作文，工会主席姚富轩同志说，这样做，同学一定会给学校领导提很多意见，他接着便说：“提意见就不应当吗？就不正确吗？”又如学校的领导要他作教研组副组长时，他不作，并向领导建议要马南风教师作，当领导对他说马南风在工资改革时思想问题很大，他便马上对马南风说：“我建议你作组长，领导上说你在工资改革闹思想问题，我马上便提出意见说，多年的十九级干部不提拔，思想当然不通”。此外他在语文组内经常煽动群众的落后情绪，向领导进攻，使组内的正气长期不能建立起来。

于真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其祖父“读书乐”、“读书高”的教育，其叔、伯、舅都在国民党时期高居官位。其堂叔父王继业曾任过三青团江西黎川书记，浙江嘉兴青年军校事务处长，伪安东省田赋处长，是少将衔，曾供给他求学费用。他族伯父任过伪萍乡煤矿局长，他父亲还借此关系到萍乡任过督察主任和堆栈主任。这一切对他的影响是向上爬，作高官，名扬天下。其舅父於润华，桂系失意政客，1926年任过武汉市财政局长，不久以后任过伪湖北省任过教授，现在退休，是民革成员。是和他一道研究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代表监察制度”的一分子。于真受了他不少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解放后仍住在萍乡，1952年“三反”“五反”时期，要求迁到武汉来住，当地公安机关因其历史复杂，没有批准，在不久以后因病落在江里死了。于真因此对政府机关极为不满，认为其父的死是由于公安机关不准迁出而死的。1954年他从军队转建后，还到萍乡质问公安机关，以后他一直是怀有阶级仇恨的。（朱健国注：如果于真不是“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多半不会划为“右派”。这种“出身决定论”与希特勒的消灭犹太人如出一辙，皆是没有共生思维。）

于真的错误事实，经过大家揭发，辩论后，于真已经理尽词穷，承认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公开宣布向人民投降，初步的交待了自己的反动言行，并在继续准备交待。但是如果于真想要耍花招是混不过去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要斗争到底的。

中共武钢干部总支整理

1957年8月20日

2006年于真吁请中共接受“共生论”

2006年7月，我在香港杂志和网发了一篇热文《于真吁请中共接受“共生论”》，对77岁的于真先生的“共生论”作了简介。现摘要如下——

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专政主义》论文近来在大陆学人中流传。其中呼吁中共借“六十大庆”之机，诚实地总结60年来主政经验，对未来作出理性明智的选择——变“党主制”为“党主立宪”。

2006年6月，77岁的于真先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五柳村等网站发表《共生论》专著第一章《共生史观》（全书计划共九章80万字；至2009年8月发表第六章，已有50万字），2006年12月网上发表《共生论》第二章“人类追求共生的思想轨迹与实践”，2007年11月网上发表《共生论》第三章“人类的灾难与危机——对百年来非共生历史与现实的描述”，2008年12月网上发表《共生论》第四章“阻碍人类共生的各种主义与教义”，2009年3月发表第五章《人类共生的关键》，2009年8月发表第六章《人类共生的基础——共生经济与利益协调》。

与胡守钧《走向共生》和吴飞驰《企业的共生理论》等专著相比，于真的《共生论》不仅篇幅长一二倍，还有三个鲜明特色：一是视界高远，站在“共生史地平线”提炼了“共生史观”；二是大智大悲，以“非共生悲剧”论证共生论——进行了“人类百年来非共生历史与现实的描述”；三是胆识超群，直面当代危害共生的首恶“专政主义”进行零距离刮骨疗毒——如此“正反合”多角度多元化地探讨《共生论》，自然曲径通幽，“屋舍俨然”。

于真在第一章《共生史观》中说，迄今五千年文明史，人类已有四种历史观：

最初是一种“神天史观”，认为神或天开创了一切，是耶和华、上帝、安拉创造了人；当社会出现能诛戮杀伐的国家权力以后，又产生了“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帝王将相、天才伟人们书写的，由此延伸，把人类历史进程看成脱离了与物质生产相关的人类意识活动——“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大反潮流，对“神天史观”、“英雄史观”、“唯心史观”一一批判，标新立异提出“唯物史观”——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阐述历史。

这四种历史观虽然各据一理，但并未抓住根本。即便是信众颇多的“唯物史观”，也有盲人摸象之虞：近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唯物史观”虽然号称历史科学的突破，却把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遗产，如宗教导善的教义，各种社会改良的运动与思想，甚至民主革命反专制的理论成果等等，都视为变革生产关系为公有制的障碍，斥为“唯心主义”，与之决裂；终致忽视人的主体活动是物质生产、知识生产、实际生活、精神价值四者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基本事实，危害深广。（事实上，人类历史是“神天史观”、“英雄史观”、“唯心史观”、“唯物史观”等历史观交叉共生使然。）

为此，于真提出了第五种历史观——“共生史观”：在诸多史观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与现实的比对与考察，当仁不让地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为“共生史观”：人类由原始部落群发展到全球国际社会，由动物界的极少数发展到 60 亿人口的大种群，由蛮荒、愚昧状态进步到今天文明昌盛，是通过漫长的、自始至终的分工合作、交流交换，为己利他共生的结果；是不断扩大共生圈（即不同范围、由小到大的生活共同体）直到今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虽然人类经常出现部族、民族、国家、宗教、阶级、集团的激烈斗争，甚至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世界大战，如果认真总结起来，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和主旋律，还是共生。共生是历史、是现在、是将来。一切非共生的经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终将在人类共生的洪流中被历史所淘汰。因为多元并存，异类同生、互利共生，是事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或生存方式；具有本原性、自组织性、共进性、开放性和可塑性等基本特征。

“共生史观”来源于对“自发共生”与“自觉共生”综合。

于真发现，动物界普遍存在的是种群内的共生与种群外的不共生。人类面前却往往展现两种生存方式：一是我活你也活，这是人道共生；二是我活你必须死——这是兽道非共生。人多在家庭族群小圈内保持共生关系，在圈外则或疏或敌，呈现异己关系。人类虽然一直试图扩大其共生圈，但其途径却多选择暴力扩大，于是后患无穷。直到二战后的联合国及其宪章精神的出现，人类才开始真正重视以和平联合扩大共生圈，克制独霸、吞并、侵略等等除异、灭异、恶异心理和行径，探索平等、互利、异己共生、和平联合的道路。这是人类共生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由“自发共生”（朦胧而动摇的共生本能）走向“自觉共生”（清晰而坚定的共生理性）。

于真的“共生史观”，建立在对历史与现实中一系列非共生悲剧的深刻批判上。他叹息，人类的现状多是“自发共生”。如目前以主权国家为独立主体的世界，实处于“自发共生”，很少有哪个国家会牺牲自己一丁点利益去谋求人类共生，多是各站在本国立场上，谋求利益最大化。以致国家内部，个人之间，组织之间，无不如此。这样的“自发共生”，暗斗明争的国际冲突与国内矛盾就在所难免，于是现实世界实为一个非共生关系。可见“自发共生”造成的一国（一民族）范围内的共生关系只是局部（或临时）共生关系，不仅不能解决国与国间的共生问题，还会加强国际间强权政治势力的扩张；只有把不得已的、迫于形势被动的共存关系转变为自觉的共生关系，把自发共生历史进程转变为自觉共生历史的进程。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才有坚实的保障。

于真相信“自觉共生”新时代一定到来的依据有七个：

一、天赋以人的群性。几万年的史前史，人类便有群居、聚群、合群的本性。

二、后天的习性：人不能单独生活和生产，必须与其相关的人接触。

三、生产活动的需要。从古至今，任何形式的生产，都是靠配合、协作、互教、互学来完成的。

四、交换的发展。人人生活在交换过程中，从交换中才得以生存，得到满足，得到快乐。

五、感情生活的必然。

六、智者的启迪。

七、宗教的引导。无论是东方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或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都成为各自的精神家园，对世俗共生均有指引的意义。

于真的《共生论》运用“自发共生”与“自觉共生”这两个观察点，总结了农牧时代（古代）中的共生、工业时代（近代）的共生、智能时代（当代）的共生，判定“民族国家共生圈是形成世界共生圈的过渡形态”，“全球和谐共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因为，从人类追求共生的思想轨迹与实践来看，不仅各种宗教中有共生因素，各种哲学中有共生因素，而且，不少人民主权运动在不断促进共生，不少政治家们在试行共生思想推动国际和平共处，建立共生理性，走向自觉共生，正在成为人类共识的新潮流。

于真《共生论》的华彩乐章，是第四章《阻碍人类共生的各种主义与教义》。其中淋漓尽致地剖析了“教权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专政主义”、“报复主义”中反共生、非共生的历史因缘与现实恶果。

试看于真对“专政主义”的“化疗”——在对百年来非共生历史与现实的描述背景上，在对意识形态灾难、恐怖主义灾难、核武扩散与新武研制的危机、自然生态危机等非共生恶果的扫描基础上，于真对“专政主义”进行了哲学家加诗人式“核磁共振”诊查——对“专政主义”肿瘤的分子结构，及其“先天性发育畸形”和“炎症退行性病变”的“全息摄影”，皆一鸣惊人。

于真首先对世界上出现过的两种专政方式——“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比较。

1、专政范围大小不同：资产阶级专政范围是局部的，无产阶级专政范围是全社会覆盖性的。

2、专政对象多少不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并不是把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全体成员作为对象。无产阶级专政则不然，随着革命的深入，建设社会主义的进展，不断有新的阶级、阶层被划入专政的范围，而在“人民”的名单里除名。以为无产阶级只对资产阶级专政，不对其它阶级阶层专政是大错了，甚至本阶级本集团的人都难逃厄运。

3、专政强度强弱不同：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度对比可分为两个方面，历史上的革命时期和执政后的恐怖时期（强度以死人数和思想宽容度为指标）。比如，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50]如从建国算起，专政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853.5689万人，如果包括大饥荒饿死人数则为6,608.3689万人之多。中共自1949年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六十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古今资产阶级专政。（详见《历史大趋势》，强剑表主编，香港新苗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因此，两种专政的危害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非共生恶果远远大于资产阶级专政。

这方面的精彩语录有——

“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从表面上看，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但仔细一看，有个根本性差异，就是资产阶级有部全民遵守的宪法，有一个民选政府和讨论法律和大政方针的议会，有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制度和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通过传媒信息公开而对政府进行监督。尽管资产阶级政府初期未实行成年男女不分种族，职业、党派、财产一人一票普选制之前，工人们在选举上受到财产方面的限制而失去投票权，可以称为资产阶级专政。但 100 多年来的发展，它的民主部分，人民的权利愈益充分，专政职能愈益缩小，而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专政）还沿用着 160 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时），90 年前（苏联成立时），60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阶级专政的概念。”

“在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照样出版发行，只要你不动手，只动口，只写书是不被追究的；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使有点异见，文遭封杀，人受监禁（甚至处极刑）。马克思可以在大英博物馆完成其反资本主义的资本论，我们的张志新、顾准们（还有因“08 宪章”入狱的刘晓波）能在图书馆里完成他们著作心愿吗？”

“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它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内的民主，可以部分化解阶级矛盾，达成民族团结。但民主不向国外延伸，所以危害性多表现为对外侵略。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阶级斗争，专政主要是内斗。前者是全民国家，后者是阶级国家。阶级国家说全民国家是假的，但全民国家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阶级国家只一部分人有政治权力统治社会各阶级。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消灭阶级，所以它对国内的危害性要大些。其实，专政主义不仅能分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分裂世界和人类。”

这就让人明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为一种非共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专政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由马克思奠立的，是他的理论成果的焦点。政治经济学论证剥削有罪，并上升为剥夺，论证了暴力造反有理的绝对性；从一开始，这一个主义所宣称的绝对正确性、科学性就让人感到是一种唯一的正确理论。如果你不能领悟，必定是你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上有问题。”

在论述了极权化是专政主义的发展逻辑，“民主集中制”是通向极权的桥梁后，于真着重辨析了“利益代表论”是专政主义的荒谬，“党主政治”是专政主义的新变形。

“利益代表论”的理论诡辩依靠荒谬的“唯一论”，它是列宁发明的一种“阶级论的利益观”，宣扬“一个阶级可以代表许多阶级，无产阶级可以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少数人组织的“先锋队”（共产党）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而党的领袖可以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主义、

一个阶级、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以一代多、以少代全的非共生逻辑上。

对于“利益代表论”的荒谬与残暴，于真引述了一个史料证据——

2008年第七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金雁写的《一月巨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文章讲的是，震撼世界的1918年1月5日，即“十月革命”后两个月，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组织当时“众望所归无人反对”的“立宪会议”选举，不料在707个席位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只得到175个席位，占24.7%，胜出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仅主流派就占370席，超过半数。对于这一民主选举结果，列宁不仅坚决拒绝接受，而且以赤卫队武力镇压他党当选的代表——在11月28日就对立宪民主党抗议示威开始了镇压，并调集忠于布党的军队进入首都，实行戒严，驱散开会议员。1月5日，面对两个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数万人的反对游行，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高尔基虽然身为左派作家，与列宁私交甚好，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暴行，将当天惨案比之为1905年1月9日沙皇屠杀和平请愿的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即民主共生宪政）。”

从主义的唯一性到阶级的唯一性，从党的唯一性到领袖的唯一性，这是“党主政治”专政的极权逻辑。它是由列宁发明，斯大林实践，毛泽东升级，金日成坚持——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奠定了政党唯一性、领袖唯一性的理论基础，其后由斯大林的极权化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革（反修灭资）而升级，至金日成传位三代子孙而顽固坚持发扬。

于真对此“天问”：“一个阶级为什么只能由一个政党领导？一个政党为什么只能由一个领袖来独断？这些非常浅显然而要害的问题，始终被禁止讨论！”

今日如何识别“党主政治”？这只要熟悉极权化的特征就可一目了然。

因为极权化是专政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逻辑，而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党主政治”，必然有许多极权化表现。于真提醒，只要记住胡适转述（美国政治家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1940年概括）的“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即可清晰地识别身边的“党主政治”。

“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是：

- 1.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 5.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 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 12.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 13.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 14.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 19.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 20.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于真说，从极权主义上述 20 项特征来分析，有 5 项是关系国家与政府的，即国家至上，政府无错；有 5 项是关系党和领袖的，即党统制一切，领袖神圣；有 6 项是剥夺人民权利、挑动互斗、消灭异己的；有 4 项是废弃学术，反理智与科学的。可见极权化是专政的本质要求，唯一性是极权化的自造依据，而“民主集中制”是通向极权的桥梁。

这就揭示，“民主集中制”是“党主政治”的关键制度保障。

于真考证，“民主集中制”也是由列宁创意，经过斯大林命名、完善，毛泽东写于中共党章，普及应用于中国所有的政治组织，成为覆盖全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集中制“看似一个万花筒，变化多端，捉摸不定，但最根本的一条，集中最高权力于一党一人的本质不变。”其要害在于：

1.它是只保证集中，不保证民主的制度。政治组织执行这个原则，就是政治组织军事化，形成“一个军队般严格的政党”，“民主服从集中，集中服从专政，专政服从统帅”。

2.民主集中，作为制度，学理上讲不通，事实上是实现独裁的工具。

3.民主集中制是无法实现权力监督的制度。“一个掌权者群体即执行官员们占 60—75%席位的只吸收倾向于或忠实于他们的代表的会议，会作出多少有利于会议外的广大被领导的群众的决议？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成员结构上的致命之处。”

于真不愧一个真正的共生论者，其《共生论》虽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党主政治与专政主义的危害，但却并无一丝“革命”主张，更无暴力革除之意，而是遵从共生哲学之逻辑，提出了一个中庸之道，建议“党主政治”改良为“党主立宪”——既保留“党主”依然生存，又限制其无法无天。

于真说，一个国家的政治由一个党作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称之为“党治制”——70 年代，苏联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有《党治制的由来》，历述苏共消灭异党及内部的斗争，实行一党统治经过。中国宪法学界则在八十年代称

之为“党主制”。这种党主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政党主权不受法律制约，等于没有立宪前的君王。

不过，也可视“党主政治”为专制主义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型的一个渡桥——中国国共两党都长期实行党主制，表现在都有国家宪法，都不曾把宪法的民主精神当回事；但到蒋经国时，国民党终于开放了党禁报禁，于1989年实行总统大选，还政于民，由党主之国变为民主之国——虽然中共至今在大陆仍然坚持党主制（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便是党主政治），无论是毛泽东的穷社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先富起来”的社会主义，都是为党专政服务的，但谁又能说，中共不会向国民党学习，出一个“蒋经国”呢？

于真由此建议中共在建国“六十大庆”之机，正视历史和现实，接受人们关于变“党主政治”为“党主立宪”的呼吁——早在1986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刘大生受君主立宪启发而提出“党主立宪”建议，并在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7期著文：《试论“党主立宪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适政体之探讨》，指出，现在只能是“党主时代”。刘大生通过20年的“党主立宪六论”结论是：“党主立宪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的妥协和合作的最合适的法律形式。”它的“灵魂即在于‘法定党权’”，他与许多诘难者，讨论的结果是“这个类似政策建议是一种非必由而是可由之路。”（《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37页）

“党主立宪”与“党主制”不同，其共生进步在于，党与群众是合作和妥协的平等双方；而党主制，就是党要群怎样便怎样，可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党“口含天宪”，是掌权的一方，群是被统治、管理的一方。

于真认为，党主政治的利弊有：

党主政治使中国改变了一盘散沙状态，能以“举国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如自制核弹火箭，登月计划。

但弊病太多，不讲民主与法治。体制上无防错，知错，说错，纠错机制，一错就得错到不可收拾。与世界民主政治潮流格格不入，与自由、平等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距不小，对西方民主视若洪水猛兽，不能在百姓面前放弃官本位，党特权。上面不说，下面不能说。最上面不动，全国不能动，社会自组织和能力很差，公民社会自律性，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的公平性都不彰显，缺乏主动性与创新性等等。党封闭家丑，控制舆论，诸事不能公开透明，制造假象，以假乱真，极度地破坏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依存关系，毫无法律的保障。

由此利弊相权，弊大于利，“党主政治”无疑是新形势下的专政主义。它不仅不能代表无产阶级，而且是个比资产阶级还更为偏私的集团，资产阶级的私有是有边界的，无产阶级公有制的私有化是无边无际的。把全国人民的资源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名先变为公，然后在权力催化剂作用下化公为私！

如此党主制实为专无产阶级政的政党，完全违背了初衷。必然遭受广大党员的反对，若不及时改正，将失去选择的时间和机会！

因此，于真大胆请“党主制”考虑五项选择——

第一种选择：“改”字当头。以民主宪政为目标，走人类政治文明共同的发展道路，改掉苏式体制，接受平等、自由的价值观，促进各国各族各阶级阶层的人人平等和谐共生。彻底放弃专政主义，平反因专政错误的冤假错案。首先是学宪法、用宪法，让党走下神坛，从国的上面走到人民这个平面上来，领袖与公民在宪法面前平等！全国人民都有发言权！只有专政主义在党内得到肃清，社会上的侵权行为才不致发生。

对于过去专政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党主制”领袖只要表明切割的立场，解密工作跟上，泰山压不了顶。一届领导负一届的历史责任，不需要背负爷爷、伯爷甩下来的包袱。

这一种选择需要非常之人，以大智大勇，成非常之功。若因循苟且一点，即丧失千载难逢时机。

第二种选择：“和”字当头。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平、和睦、和谐、少事。也算新“三和一少”。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拔和内定机制是上一代掌权者的人事关系折冲制约、保持平衡决定的。伯乐不能得罪，“叔”乐也不能得罪；富得流油的不能得罪（这是政权的后台，原来有权，现在又有权又有钱的），那些穷哥儿玩命的也不能小看。这样为“富人”作主的党，很适合许多升官发财心理。只是这种治表不治本的“和谐”，往往一个感冒就会引来“病危”，难以太平盛世梦万年。

第三种选择：“拖”字当头。“拖”是不作为，反正一届5年，顶多10年。只要党国不倒在我手，就无怨无悔。但如果这种态度比慈禧还不作为，最后会连立宪也没机会。如此将矛盾愈积愈多，嫁祸于后继人，让党失去“有病早治”机会，党内改革派会让其它长期拖下去？

第四种选择：“保”字当头。“保”是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有提改革者，则以保守态度待之。保“党主制”，保它的一规一矩，一字一句，一草一木。中国近三十年改革，政改除废领导终身制为任期制一点实效外，至今无大作为，就是有一批明改实保的人在作祟。改革只改到“让一部分人（官商）先富起来”，完成了权力向财富的转型，巨富与特权齐飞，就宣布“稳定重于一切”，以“减兵增灶”方式撤退政治体制改革——一面拒不申报财产，变公产为私财，变内资为外资，再投资于内，享受优惠；一面用假嗓子高唱“以民为本，立党为公”，逍遥法外！如此下去，党国何堪！领袖何颜！

第五种选择：“抗”字当头。“抗”是抵抗世界人权民主潮流，仍然坚持专政主义的一党专政思想与作风。对爱国爱党的建议言事者，不仅不予倾听，还要敌眼相看，视为异己敌对份子，继续挥动30年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大棒，封杀其言论，诬陷其人身，让文革死灰复燃，为专政体制保驾护航。如此必堕党于不义，最后让党国“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专政难以共生，共生才能长存！请党主三思五种选择！

于真最后说：写完此节，如释重负，灵魂得救。谨以此作一柱心香，郑重吊祭百年来被专政主义（“党主制”）所残害的7,481万个亡灵！

以上节略虽然挂一漏万，也可管中窥豹，体会于真的《共生论》的思想性、学术性与现实性。

也许《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的问世，有助于真的《共生论》落地？

从简单地反左到倡导左右共生，从形而下地对执政党提意见，到形而上地研究改革主义，向往共生梦，可见1957年的“右派”们已焕然一新，以“重合”求共生，以“激进的中间派”为共生前沿基地，愿意与“左派”一起从“共同底线”走向共生。

洪湖县委的“消极反右”寓言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中6名右派来自湖北省洪湖县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全国2,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有没有一个县级党委暗中同情“右派”，大胆少划“右派”？有！多方史料显示，当年的中共湖北省洪湖县委，在中共县委书记李金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韩耀辉以及后来的县委副书记、县长辜呈清的合力“消极”应对下，创造了比周边邻县（如沔阳）人平少划“右派”率达29%的奇迹——沔阳县824人产生一个“右派”，洪湖县1,157人产生一个“右派”。几年后，洪湖县这个“反右消极县”，又大胆抵制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早稻，全力“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保护“三层楼”农产品自由市场，由此成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荆州地区11个县中唯一没饿死人的县——1960年荆州地区有10个县饿死人，有关部门通报，10个县饿死人数共超过十万（据李金玉2002年9月14日回忆）。自然，大权在握的极左派后来秋后算账，借“四清”、文革宣布“洪湖县委彻底烂掉了”，将李金玉、韩耀辉、辜呈清、徐伟、马香魁等打成“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党集团”，撤职下放农村劳改十多年。

由此，以李金玉为首的洪湖县委创造了一个“消极反右”寓言——官敢“消极自由”，民可“积极求生”；“右派”一时遇难，“极左”遗臭万年——舍去一顶乌纱，与民万古共生。

武宜三主编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32,000多个“右派”名字，有6名“右派”姓名来自湖北省洪湖县，他们是——

张瑞华，女，26岁，洪湖县文教卫办公室的干部，1957年内定“右派”后投井自杀；

于静之，女，洪湖县文教局干部；1957年划为“右派”后下放劳改；

张淑卿，女，洪湖县新堤镇一小教师，1957年在沔阳县仙桃小学划为右派后，结婚到洪湖，1965年再度被下放农村；

邓文烈，男，23岁，洪湖人，洪湖县财政局预算股股长，中共党员，只因开玩笑说刘少奇是现代陈世美，划为右派；

李全忠，男，31岁，贫农，企业股副股长；1958年3月划为右派下放农村；

李丰洛，男，40岁，税务专家，1958年3月划为右派下放农村。

沙雄斌，男，28岁，1957年8月任洪湖县地方工业局局长，1958年3月反右时查出其曾在黑板报上写过一首诗“我的钢笔笔尖已生锈，因为如今不敢

自由说话”，遂被定为右派，1958年10月将其撤职下放农村。

邵永年，男，37岁，1958年3月任洪湖一中副校长时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后，1981年—1984年任洪湖县人大副主任。

史载，当年湖北“全省共划戴帽右派32,200多人”，还“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划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或‘思想反动分子’约4,000人”；洪湖县共划了363人，占全省71县右派总数的1.1%。查《洪湖县志》、

《沔阳县志》、《石首县志》，可见洪湖县所划右派分子数量明显低于周边县：

1957年洪湖县人口约42万人，被迫划右派分子363人，平均1,157人产生一个右派。当时邻县沔阳县约78万人，划右派分子946人，平均824人产生一个右派。石首县约30万人，划右派分子335人，平均895人产生一个右派。按沔阳县824人产生一个右派的标准，洪湖县应该划510个右派，但洪湖只划了363人，少划147人。这显然与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的“消极思维”有关。

沔阳县反右史料有——

“（1957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沔阳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扩干会，动员开展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后来，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1959年春，运动结束，全县共有946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1979年，全部予以平反改正。”（《沔阳县志》，仙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1版，P23）

石首县反右史料是——

“（1957年）10月5日，（石首）县委设立整风办公室以，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帮助整风，个别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次年秋，开展反右派斗争。由于工作扩大化，全县共划定右派分子335名。1979年后，有334人经甄别为错划予以改正。”《石首县志》，石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红旗出版社1990年8月1版，P29）

湖北省委的反右运动部署

2002年9月14日11时许，李金玉在荆州回忆“反右”、“大跃进”时的“洪湖策略”，说：“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世间已无李金玉》，《山西文学》2003年2月号）

中共湖北省委的反右运动部署始于1957年5月5日——从中可见当时省委施加的极左压力极大。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湖北省委于5月初开始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深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5月5日，省委负责人邀请党外知识分子座谈，听取批评和意见。5月10日，召开中共湖北省委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讨论通过了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

指示的初步方案》。5月底，各机关、团体和大专院校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大家提的批评和意见，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诚恳的，也有一些偏激或错误的意见，只有极少数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对这种言论反驳是必要的，但采取了‘反右派斗争运动’的方式进行，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反右派运动中，全省共划戴帽右派 32,200 多人，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划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或‘思想反动分子’约 4,000 人。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年 11 月，在机关反右派运动基本结束的阶段，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省委决定下放干部 70,000 人到农场或农村劳动锻炼，其中省直机关单位下放 8,000 余人，在武汉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下放教职员工 2,500 余人。这批下放干部，经过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以后，一部分回到原单位，一部分被分配到基层单位工作。”（《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1 版，P490）

当时离湖北省不远的山东省、河北省，反右特点是矛头向上（向省委高层开炮）——

中共山东省组织史资料关于反右运动的回顾说——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全省即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全省原划定的 34,800 余名右派分子中，属于错划的达 98.6%，他们大多被调离原工作岗位，下放劳动改造。”（《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 1 版，1,200 千字，P355）

不久，山东省又进行了“整风补课”——

“1958 年春至 1959 年 8 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山东）全省先后开展了‘整风补课’、‘反地方主义’和‘反右倾’斗争。1961 年春，全省又相继开展了‘反瞒产私分’、‘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先后有 53 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工人、农民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处分的党员有 92,303 人，占全省党员总数的 6.3%，其中开除党籍的 37,216 名，留党察看的 18,351 名，撤销党内职务的 11,443 名，开除党籍的占受处分党员数的 40.3%。受处分党员中，中央管理的 77 人，占同级党员数的 19.6%；省委管理的 393 人，占同级党员数的 20.8%；地委管理的 2,484 人，占同级党员数的 18.1%。在‘整风补课’和‘反右倾’斗争中，共处分省委委员、候补委员 17 人，占这一届委员、候补委员总数（56 名）的 30.3%。其中被开除党籍的 7 人，留党察看的 2 人，撤销党内职务的 8 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健民被错误地打成‘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夏征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刘秉琳，

省委常委、济南第一书记王路宾，省委委员、副省长袁子扬等分别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党宗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地批判和处理，后果是严重的……1960年10月20日至22日，在中央和华东局的帮助下，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对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后，中央和华东局决定，撤销舒同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书记处书记职务），派曾希圣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1,200千字，P355）

河北省则在反右运动后又处分了2名地、市委书记——

“由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严重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有2名地、市委书记这被定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千多名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党内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状况。”《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1,148千字，P574）

“汉阳事件”对洪湖县的“反右”压力

与山东重点向上不同，湖北省委反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点打击县域右派和学校右派，并且大开杀戒。比如，与洪湖县接壤相邻的汉阳县，1957年6月12日暴发了震惊中外的“汉阳事件”——“汉阳事件”成为全国反右运动中首开杀戒的先例——将中学师生中的“右派鸣放”作为反革命暴乱而开枪镇压：

“发生于1957年的‘汉阳一中事件’，是部分学生为升学问题自发地进行罢课、请愿闹事的事件，当时竟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而震惊国内外。后来复查证明，这是一起失实的冤案。这起冤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制造了不少人间悲剧（造成四人被判处死刑冤杀，其中三名老师，四名老师痪死监狱，十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冤狱多年，至少37个家属遭受株连，几百名学生（内定右倾）升学分配遇到麻烦），而且在国际、国内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汉阳一中事件始末》，武汉市蔡甸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2000年9月内部出版，P1）

“汉阳事件”中至少有44名局外人被明确定为“右派”——“有44人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对‘汉阳事件’所持不同看法，作为划右派的一个问题加以认定”——

“（汉阳事件1986年平反）在政治上共为98人下达了彻底平反文书104份（有6人为党政双重处分），其中各级法院撤销原判23人，公安机关撤销原处理决定7人，市县政府撤销原处理决定14人，组织部、纪委、团委撤销原处理决定29人，学校撤销原处理决定27人，其它部门纠改4人。上述98人按报处单位划分为20案，汉阳事件考察团报处1案73人，政法机关报处4案10人，部门后来报处的15案15人。这些蒙冤者原来的处理资料都查到了……抚恤和补助费共约9万元。在就业方面，一是恢复当事人公职，安排工作5人，办理退休2人；二是安置了受株连家属子女就业138人……50名受过各种处理的原一中学生分布在10余个县市，县教育局迅速一一查到下落……汉阳事件已历时

29年，查明有处理文书应予平反的74人，另有44人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对“汉阳事件”所持不同看法，作为划右派的一个问题加以认定，但1979年均已平反改正，故没有必要重新平反……（《汉阳一中事件始末·得人心暖人心的善后工作（汉阳县委机关退休干部穆心言）》，武汉市蔡甸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2000年9月内部出版，P39）

2012年2月，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刘富道出版40万字的长篇纪实《汉阳事件》（台湾秀威·新锐文创公司出版2012年2月第1版，北京《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2年5月转载，人民网随后报道读者热评新闻），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汉阳一中师生74人的蒙冤，进行了有名有姓的细述：“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被判处死刑；胡平轩、邹振钜、胡斌、滕永俊（学生）等1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邹振钜因脱逃、盗窃处死刑）；教师张安建等3人被送劳动教养；教师雷永学、校医刘少丹等3人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监督工作；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受党纪政纪处分；余明超等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还有数百名学生被‘鉴定’，材料装进了档案。县法院院长王志成、吴克华等10余名县直机关干部因‘汉阳事件’株连，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刘富道在书中“立此存照”了“汉阳事件”属于“反右运动”的最高法判决书——《湖北日报》1957年9月7日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57年度刑复字第203号）称：

“被告人杨焕尧，解放前曾任过伪保卫团团董，伪县政府承审员、军法官、伪法院检察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职。杨犯曾发展过国民党员数名，并布置监视我党活动。1939年，杨犯任伪随县军法官时，曾判处我地下工作人员陈国云、钟某二人死刑。1947年，任伪孝感地方法院检察官时，接受凶手杨寇[原文如此]军贿赂，竟诬雇工杨胜金谋财杀死杨李氏，使杨受冤被押三月以致病死。杨犯在解放后混入革命阵营后，一贯敌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历次运动中散布反动言论，披着民主党派的外衣，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杨犯即请示右派分子马哲民、陆鸣秋，定下了在汉阳县大肆招兵的计划，并决定以汉阳一中为其活动据点。随即搜集该校教员名单，进而与王犯建国勾结，指定由王犯为该校民盟负责人并一起策划在汉阳一中借发展民主党派组织为名，扩充反动势力。杨犯更大肆活动，到处煽动说：‘汉阳县宗派主义严重，墙有太行山高，沟比海洋还深，春风还未吹过城头山’。并歪曲我党统战工作是‘统上战下’。在图书馆中，则乘学生看书的机会，故意介绍和宣扬应城县学生罢课情况，煽动学生闹事。杨犯并为首与王犯建国等一起召开秘密会议，阴谋篡改汉阳一中学代会的性质，煽动学生在学代会上向党进攻。会后即对学生杨孝义等说：‘今年招生比例小，不要紧，可以争取，争取不上可以罢课游行示威’。暴乱开始后，杨犯在幕后积极进行指挥，指使学生到邮电局去打电话，阴谋发动汉阳二、三中学生参加，以扩大事件。在杨犯指使下，学生就闹到邮电局并要打毁电话总机。他还在文化馆对正在看书的学生肖书成说：‘你们还在这里搞么事，这样热闹的场所不出去参加？’煽动

他们上街参加暴乱。6月12日晚上，杨犯又到一中，指示王犯把事闹得更策略一些，说：‘你们这样闹下去是不好下地的，应有组织有纪律地来闹’，并鼓励王犯说：‘你要领导起来。’暴乱事件平息后，杨犯为混淆视听，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竟说：‘一中闹事的行为，只要不是同台湾美蒋有联系，还不能认为是反革命活动。贴张把反动标语，也不能算反革命活动’。按杨犯解放前曾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与王犯勾结，策划和煽动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发生暴乱后，又在幕后积极进行指挥，实系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汉阳事件》，刘富道著，台湾秀威·新锐文创公司2012年2月出版，P353）

在中共湖北省委的“反右部署”督导下，荆州地区的“反右运动”雷厉风行展开

“（1957年5月14日，（荆州）地委根据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面研究了开展整风学习的问题，成立了由孟筱澎等9人组成的整风学习领导小组。接着，发出了《关于县以上机关干部深入开展整风学习计划》以及《关于执行省委整风运动初步方案计划（草案）》，确定1958年底以前在全区分期分批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从1958年1月开始，在地直及县直机关、文教等单位先后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1958年3月底，反右派斗争结束，转入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据江陵、松滋、公安、石首、天门、沔阳、京山等7县统计，有2,913名干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中国共产党湖北省荆州地区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P239）

“（1957年）8月15-19日，（荆州）全区各县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大鸣大放’辩论。会后，全区开展整风整社运动……（1958年）1-6月，地直及各县直机关、文教等单位先后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荆州地区志》，荆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红旗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P25）

“消极的洪湖县委”

省委、地委如此全力以赴进行反右，再加上“汉阳事件”对洪湖县“反右”的压力，“消极的李金玉”也只得让洪湖县表面上反右热热闹闹，自1957年7月8日发出了洪湖县人大《关于谴责右派分子的决议（草案）》，8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动员开展整风运动，12月15日，将全县中小学老师到新隄集中，进行整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最终以划定右派分子363名应付了事——县委领导中没有划一人右派，仅县财政局就抵制了上级增拨的“8名右派指标”。

请看相关史料——

“（洪湖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7年7月4日至8日在新隄召开。到会代表222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决有关文教卫生方面的问题。会议要求妥善安排好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鼓励、帮助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雷应时代表县人民委员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罗国钧作了《关于复员安置工作的发言》，陈鹏程作了《关于洪湖县1956年财政决算和1957年财政预算的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谴责右派分子的决议（草案）》。”（《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P154）

据《洪湖县志》，汉阳县的新滩区1956年7月划归洪湖县：“1956年7月2日，湖北省人委会决定将汉阳县新滩区的大型、北洲、宋家、霍家和荻障五个乡划入洪湖县。”（《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50）

由此，可知当年的“汉阳事件”对洪湖县的反右压力有多大。但即便如此，李金玉和洪湖县委依然千方百计消极应对“反右运动”，尽力少划右派，宽容右派。

洪湖县的“反右运动”表面上在照常进行——

“（1957年）8月，中共洪湖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动员开展整风运动。会后，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李金玉、韩耀辉等到区、镇邀请教师举行十多次座谈会，倾听党外意见，推进整风运动。”（《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P20）

“（1957年）9月，全县农村分三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1月基本结束。”（《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P20）

“（1957年）12月15日，全县中小学老师到新隄集中，进行整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此后即在教育界和县直机关陆续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划定右派分子363名。”（《洪湖县志》，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P20）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洪湖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全县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县委成立了整风委员会，先后集中文教系统、财贸系统、县直机关干部进行整风反右，运动中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揭发和批判了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在整风的前提下，随即转入反右派斗争。县、区两级共集中干部1793人（占干部总数53%），被错划成右派分子363人（后全部平反）。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错误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P68）

但实际上，李金玉和洪湖县委却在共同以“消极自由主义”对待“反右”运动。尽管李金玉等人当时根本不知道西方有个叫哈耶克的经济学家以“终身的高瞻远

瞩”创建了“消极自由主义”，认定“计划经济”必将导致极权主义，让人们走向“通往奴役之路”，但是，洪湖历史上残酷的“反右倾”教训造成的极左灾难，太深刻了，让李金玉和洪湖县委本能地时刻警惕“反右”，从直觉上感觉农民和平民的感受比上级官僚和中央领袖的“英明指示”更能让人们奔向共产主义——当时的李金玉和洪湖县委对理想还毫不怀疑，只是对上级指示常常不符合实际，体现出“致命的自负”，不得不以“消极”救民于水火。可见一个干部只要人性高于党性，注意本地身边活生生的历史教训，也会像海瑞一样暗暗修正“最高指示”。

1931年的洪湖“反右”

李金玉和洪湖县委要像海瑞一样暗暗修正“最高指示”，因为早在26年前的1931年，洪湖地区就有活生生的“反右”历史悲剧——

“1931年3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3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止，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的地位时期，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执行了王明的路线，因而在斗争中犯了错误，给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左’倾路线集中表现：在军事路线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打大城市，不许打小据点；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反对贺龙同志的巩固根据地，逐步扩大苏区的主张；在土地革命中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扩大了打击面。在肃反问题上过左的肃反路线，造成肃反扩大化，使党损失了大批的优秀干部。”（《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纂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P473）

党史专家说：1931年夏曦接替邓中夏主持湘鄂西工作，虽然批判了邓中夏错误，却因没有检讨一把手有“最后决定权”的制度错误，因而又有“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导致万名优秀干部被冤杀，“革命力量的削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

“湘鄂西党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和政治保卫局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对敌人的诡计缺乏高度警惕性，不加具体分析就轻信了敌人口供，因而，先后逮捕了红八师政委段书桂、九师政治部主任彭阔陆以及万涛、李剑如等领导干部。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也于1932年在鱼阳关被捕，不久在麻水被杀害。”（《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纂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P475）

“在这样严重的关头，夏曦并没有清醒头脑，反而继续扩大肃反面，发展到省县地区机关。被无辜杀害的有：湘鄂西省苏维埃副主席马武，石首县委书记张继陔及县苏维埃主席，监利县苏维埃主席李铁青、李功陔，沔阳县委书记许栩，县苏维埃主席郑重和洪湖人民的优秀儿子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等地方

领导干部。此外，军队连级以上干部，地方区级干部不少因‘喝茶会、并臂会、扇子会、麻花会、好吃委员会’等怪罪名而被相继杀害。1932年在坪坊刘家洋房里召开区级以上党委常委会，会上逮捕了坪坊区委书记张和芳、党组织科长徐梁三、区委秘书王力行、团委书记刘德华，只有富农出身的刘德华供认以掷瓦片为暗号纠合改组派而没有被害，余者无一幸免。”（《洪湖革命史》，《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纂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P475）

“正如贺龙同志说：‘在党内军内，把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优秀干部，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中共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更指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党内极为痛心的失败。’”（《洪湖县志》，洪湖县志纂修委员会编，1963年8月内部出版，洪湖县新华书店发行，P476）

正是因为洪湖在1931年的“肃反扩大化”中留下血的教训，所以1949年后，洪湖党政干部特别注意宽容不同意见。为了引以为戒，在《洪湖县志》（1963年版）中专题批判了历史上的“湘鄂西极左肃反”。

1960年至1965年任洪湖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的陈鹏程，在2019年1月5日17时许回忆：《洪湖县志》（1963年版）本是根据中央张大姐（张文秋，毛泽东亲家）1951年慰问洪湖后多次提议而编写的。从1962年春起，李金玉组织了全县五十多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编纂《洪湖县志》，其中第六编《洪湖革命史》中，特辟了“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革命力量的削弱”一节，这一个空前大胆而惊人的标题，极其有力地突出了警惕“极左肃反、反右”的宗旨。而其中对于被“极左肃反”和“反右倾”冤杀的优秀干部的记述，更是震撼人心。

专家评价：“1963年版《洪湖县志》”是成立于1951年6月4日的洪湖县首部县志。这部《洪湖县志》虽然囿于当时“三面红旗”的极左高压，有一些左的语句，但却是打着“左的旗号反极左”，通过记述“洪湖革命史”的名义，首次公开专题批判历史上的“湘鄂西极左肃反”——独辟蹊径地研究湘鄂西极左肃反史。后来，无论是“1992年版《洪湖县志》”还是“2014年版《洪湖市志》”，皆无专章论述“湘鄂西极左肃反”。甚至连1993年1月出版的《洪湖革命史话》（洪湖市教育委员会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删去了“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这一反极左肃反的重要章节，书中只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和苏区的丧失”，让三十年前已有的洪湖革命史反左研究大倒退。

而今看来，“1963年版《洪湖县志》”成为“洪湖县委的永远‘反右’寓言”。

“装模作样”敷衍极左潮流

据原洪湖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田性初回忆：“解放初期，领导民主作风相当好。当时，有一种风气，领导鼓励大家提意见，敢跟领导提意见的是一种进步表现，不敢提意见的是保守落后自私的表现，旧意识严重。有时，领导之间，领导与下级，在工作上有分歧，争论得面红耳赤，散会就无事的。有个别区领导，经常跟县领导闹点矛盾，县领导也不在意的，认为工作上的分歧是

正常的。该提拔照样提拔，不存在压下的问题。在那种环境下，思想、工作是自由的，无任何约束，人的聪明才智，充分的发挥出来了。那个时代，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亲密无间，我在县委机关、书记、县长、一般干部、以及通讯员、炊事员等等，同桌吃饭，有说有笑，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无拘无束，有困难或生病，互相关照，不分彼此，像兄弟姐妹似的，感情相当深刻。1957年反右派之后，再见不到这种好作风了。”（《醉翁记》，田性初著，武汉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P58）

这就是说，尽管李金玉等实行了“消极反右”，但“反右运动”仍然给洪湖的政治生态以重创。只是相比其它县，洪湖县仍然如同“世外桃源”，宽松许多。

原《洪湖报》副主编张时勋回忆，李金玉常常“装模作样”敷衍极左潮流：

“1958年春，县委领导指定我负责报社的全盘工作……一次，县委书记李金玉为‘大办钢铁的冲击波’犯愁。他对我说：‘洪湖出水不出铁，我搞点装模作样，你要迅速作出反映。’于是，我尽快……帮助整理李金玉‘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文章，用整版篇幅进行报道。这种报道，是应付潮流的。”（《洪湖文史》第八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4年11月内部出版，P209）

就在《洪湖报》这种声东击西、“装模作样”的掩护下，洪湖的反右运动也比其它县消极。

韩耀辉解救两个右派的故事

李金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的“消极思维”，得到县委常委韩耀辉、徐伟、辜呈清、马香魁、冯庆元等一班人的共鸣。

2017年8月26日晚，82岁的退休干部朱同福（原洪湖广播电台台长）讲述了县委副书记、县长韩耀辉1958年解救一个右派的故事——

1958年春的一个晚上，洪湖县文化局在县人委会议室召开对本局女右派于静之的批斗大会。会上，三十来岁的于静之被勒令穿上了农村人送葬穿的纸做的一套孝衣，并且戴上写有“女右派”的高帽子，随着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女右派于静之被人架了飞机……

这时，27岁的年轻县长韩耀辉从窗外走过，发现了于静之被勒令穿上了纸做的孝衣和右派高帽子，立即进入会场制止，韩耀辉说：“同志们，对于批判右派，我们也要依法办事。大多数右派，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也有人格尊严，我们还是依法尊重。不能过激！”

听到县长发话了，会议主持者当即去掉了于静之的纸孝衣、高帽子，向她道歉后让她坐在椅子上，继续开会……

此外，韩耀辉还有保护“右派”家属的美名。2017年8月23日，有人提供了两张有县长韩耀辉签名的老奖状，颁发日期分别为1957年12月20日和1960年元月20日，获奖者皆是洪湖县人民银行信贷股负责人孙光霁。知情者说，孙光霁的妻子张瑞华早在1957年11月被内定为“右派”，跳井自杀。这一老奖状算是老县长韩耀辉保护右派的铁证——时年26岁的张瑞华本是洪湖县文教卫办公室的干部，当时文教卫办公室分了一个划右派指标，在讨论划谁为“右派”时，

正好她出差在外，大家就内定张瑞华当“右派”。张瑞华回来获知这一“内定”消息，悲愤万分，当晚就在在洪湖县人民委员会大院的一口古井旁边徘徊几个小时，最终在子夜投井自杀。

2019年2月25日11时许，韩耀辉的长子韩涛从荆州来电话回忆：父亲韩耀辉生前曾说，当年反右时自己一直对“分配名额划右派”的“上级规定”想不通，认为这一政策祸害无辜好人。听到张瑞华在“指标压力”下错划右派自杀的消息，非常悲愤，即在县委书记李金玉的支持下，通知有关部门：为避免张瑞华丈夫孙光霁和女儿张萍、儿子孙建新受牵连，不在张瑞华的档案中放入“右派”材料。同时，每年评县劳动模范时，都大胆批准张瑞华丈夫孙光霁为县劳模，完全不顾当时右派家属不能获政府奖励的“政治规矩”。

据韩耀辉的次子韩云涛2019年1月25日13时54分微信，父亲不仅敢帮助“右派”，还暗中关照“三种人”：1980年父亲平反任荆州交通局局长后，明知原洪湖县人委办主任陈鹏程文革调任荆州公路段时，得罪了地区一个副专员，被地委内定为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三种人”，要调离机关，永不重用，却仍然上门向那副专员疏通，最终得以让陈鹏程保留了行政科长职务。但陈鹏程不知内情，多年抱怨父亲没有让他升为处级。限于组织纪律，父亲一直不能对他明说，只能“做了好事还被终生误解”。

李金玉、辜呈清联手“保护右派结婚权”

2017年12月9日，李金玉和新县长辜呈清批准女右派与县农业局副局长结婚，并居住于县委大院的故事也得到当事人证实。原洪湖县农业局副局长李传清当日回忆，如果不是李金玉和新县长辜呈清相救，他就无法与右派女友张淑卿喜结连理：

时年83岁的李传清回忆，他自小面貌生得老相，一直找不到对象。1961年，他结识了沔阳仙桃小学老师张淑卿，两人情投意合。但张淑卿已被划为了右派开除公职，县委统战部几个领导坚决反对李传清这一婚事，公开说：如果李传清坚持与右派结婚，就立即将其赶出县委机关！县委机关岂能住一对右派夫妻？

李传清说：“事情拖到1962年，我已28岁了。走投无路，我只好试着找县委书记李金玉。李金玉鼓励我完成这一婚事，说：右派也有结婚权，右派也要给出路，现在中央有给右派摘帽的精神，要积极贯彻。最后，县长辜呈清批准了我的婚礼，亲自给我妻子张淑卿安排了工作，到县城新隄镇一小当老师，并让县人委办公室主任陈鹏程给我们在人委会议室主持了隆重的婚礼。事后有人告诉我，因为1962年蒋介石在台湾喊‘反攻大陆’，所以中央有了为右派摘帽的安抚精神。李金玉一向同情右派，抓住这一机会，为不少右派摘帽了。不过，这事给李金玉带来大麻烦，一个追求过我妻子的人将此事写信告到薛坦那里，成为薛坦后来整李金玉的一大‘保护右派’罪证。1965年李金玉、辜呈清等蒙冤打成反党集团后，我妻子张淑卿又以摘帽右派罪名下放曹市公社农村，我也遭受株连一起下放曹市公社。直到1979年才平反。”

“李金玉保护右派”，民间还有许多故事。据原副县长孙克惕一文记述：文革中一次批斗李金玉的大会上，有人就揭发：“李金玉亲自为摘帽右派李××写翻案书，要他带着翻案书找造反组织挂勾，翻1957年反右派的案；是李金玉为右派分子廖××的翻案出谋划策，廖在李金玉的指使下，写出了四清运动的十条罪状，恶毒咒骂伟大的四清运动……”

陈鹏程关于县财政局少划八个右派的回忆

2019年1月19日18时许，1957年任洪湖县财政局长的陈鹏程电话中向我回忆，由于县委书记李金玉大胆实事求是，让洪湖县财政局少划了八个右派：

“1958年6月，（我）从地委党校学习回来后，发现在家代理主持工作的老红军（李朝正）将财政局业务骨干17人都划成了右派，极为心痛。闻讯上面又拨了8个右派指标，要在财政局再增加8名右派，即向县财贸政治部主任靳福才汇报不同意再增加右派的理由，但靳福才主任在半昏睡状态中听完汇报后，却警告：“不要为右派说话，要小心自己成为右派！”我（陈鹏程）只得紧急向县委书记李金玉汇报，李金玉称赞了我实事求是的勇气，让我写出书面报告，由县委批示同意。财政局因此少划了八个右派。”

2019年2月16日18：30分，远在荆州的陈鹏程又在电话中向我补充：

“当年洪湖县财政局所划的17个右派，还记得三个人的名字：一个叫邓文烈，男，23岁，洪湖人，预算股股长，中共党员；15岁参加革命，贫民。只因开玩笑说‘刘少奇是现代陈世美’，被揭发划为右派。第二个叫李全忠，男，31岁，贫农，企业股副股长。第三个叫李丰洛，男，40岁，税务专家。八个拟划右派也记得四个人的名字，他们是：驻巴东税务员彭富强，企业股副股长欧阳锋，柴山管理站副站长陈赋初，税务干部周力生。”

李金玉在1957年对右派的宽容，还可从《洪湖报》让“反动嫌疑人”任伯琴书题写报头上可见一斑。

张时勋1994年回忆：“（《洪湖报》）报头三个字，由县京剧团演员任伯琴书写。”（《洪湖文史》第八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4年11月内部出版，P208）

任伯琴什么背景？原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夏志芳回忆，任伯琴因曾是日伪政权的书记官，建国后一直视为坏分子：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三月，任伯琴先生诞生于河北省定县一家书香门第。他自幼在父亲教导下饱读诗书，并苦练书法，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勤劳不辍，因而名声远扬，邻里敬重。1923年春他19岁时完婚，次年年初即生了一个女儿。不久，由人介绍，到军阀吴佩孚属下孙传芳的炮兵团任书记官（即文书，下同），并驻军于上海。因在军阀部队中不择友地广交游，便染上了抽鸦片、逛妓院、玩剧场、酗酒赌博等恶习，把身体也摧垮了，弄得弱不禁风，但写起字来，仍然磅礴有力。北洋军阀垮台后，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无以为生，遂溯江而上，辗转至湖北沙市。经多方设法，寄住于沙市汉伦书纸铺誊写石印，长年累月刻苦工作，才算找到了一个饭碗。日寇沦陷荆

沙地区后，先生遂被江陵县日伪政权聘为书记官……解放后，沙市等重镇均已改为铅字排版印刷书刊，石印即被淘汰，任先生便濒于失业境地。幸好 1951 年湖南人曹子宽会同冯秉璋等在沙市发起组织劳工京剧团，任先生便与唐、胡、邓、刘等人以票友身份下海而积极响应，劳工京剧团遂正式成立，在湖南常德、津市和湖北石首、公安一带巡回演出，借以谋生……1956 年元月，全团至新堤演出，为当时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等人赏识，便邀留洪湖，于同年三月一日正式更名为洪湖县京剧团。从此，任伯琴先生便在洪湖落藉了。”（《洪湖文史》第十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洪湖文史》编辑部，1997 年 5 月内部出版，P162）

《洪湖报》乃县委机关报，李金玉不按照政治规矩，既不自己题名，也不请上级领导题名，偏偏请任伯琴这个昔时日伪政权书记官、今日京剧丑角来题写，真是惊世骇俗的博大共生情怀！

张文杰解密李金玉手稿

《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曾说，1957 年右派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新时期的“自由派”，都是同一类改革派：

“建国后有三种被视为‘异端’人物，一种叫右派分子，一种叫造反派头子，一种叫自由化分子。其实三种人是一种人，都是深藏地下的地下水，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机遇下，从地下喷出地面。他们全是社会上最活跃最不安定的分子，天生具有叛逆性格，他们不甘心被压在地下，永远沉默地生活着，企图以自身的能量淹没大地，冲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一支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敢死队，因而他们注定被人利用最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口述历史》，左方口述，沈洪记录整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初版，P181）

这段话恰好观照了李金玉、辜呈清、韩耀辉等人的命运。李金玉、辜呈清、韩耀辉在 1957 年消极应对反右运动，极力宽松“右派”，结果十年后的“四清”、文革中就自己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右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反党集团”也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所以李金玉等和“右派”一样，从 1966 年起，长期下放到农村劳改。

但是李金玉等从不屈服。据张文杰解密李金玉手稿，李金玉在 1971 年 7 月 24 日的日记中说——

“7 月 23 号队长通知我到县里来，我自个准备了应用的东西，就于 24 号早上起来到曹市搭汽车，上午到新堤。到（县革委会）专案办公室后，就要我到学习班报到。我来学习班后，吴方培（县法院干部）和我说：你把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活动写个书面材料。我说可以。我写了个下午。到了晚上，吴又把我喊去，要我着重写三个问题：一是你怎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二是你怎么攻击四清运动的；三是洪湖的这些重大问题与你是些什么关系。我听了以后就着手写，连夜写了交给了吴方培。其中写了京钟荆饿死一大批人的问题，四清及以前问题。所谈的这些材料也是马香魁提供的。洪湖的问题也是与我有

直接关系的。具体内容写好后交给了吴方培。”（此据张文杰对李金玉手稿照片的识别整理，2019年2月17日发给李树英转我。（张文杰今年78岁，文革前在洪湖县委机关打印过李金玉手稿，1984年8月任洪湖县石码头区区委书记，后任荆州地区洪湖管理局局长[处级]。文中“吴方培”，张文杰先识别为“关先培”，现参考盛先忠提供的1971年由县法院干部吴方培主管李金玉专案史料，修订为“吴方培”。）

李金玉在1971年7月24日的日记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即使是在文革后期处于“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绝境时，他仍然大胆揭露薛坦等荆州地委领导者推行极左致“京钟荆饿死一大批人（“三年自然灾害”荆州在区饿死十万人）”。这就极好地解答了李金玉何以敢在1957年比其他县少划许多右派，敢于将沔阳县划的女右派安排到洪湖一小当老师。改革派与右派、造反派，其实都是不同时期的思想解放者。李金玉等“右派”、“走资派”、“反党集团”，其实是一种从共产主义走向共生主义的改革派。

1960年12月，李金玉抓住地委新领导（省委常委兼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下达的进一步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新精神，在洪湖县城江堤老闸背上建设与湘、赣五省自由交易粮食棉花油料等商品的“三层楼”自由贸易市场：同时提出以“开笼放雀”、“开荒归己”、“扩大自留地”等宽松政策“让农民坛坛罐罐都装满”，主张“农村工作要多听农民意见”，而不是“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这都是二十年后农村改革的先行之举。

文革中，李金玉更敢于像“右派”那样痛批顶头上级地委书记薛坦。

据原洪湖县文教局教研室盛先忠老师2018年4月8日回忆，1968年1月23日上午，在洪湖县大礼堂举行的千人参加的《洪湖县粉碎假四清真复辟揭批大会》上，李金玉手持四十多个笔记本，以两个多小时的发言揭批薛坦的在洪湖蹲点指导工作时生活腐化和官僚作风。2019年2月，张文杰根据李金玉笔记照片整理出相关史料，李金玉当时在会上批薛坦最精彩的是第八条——薛坦天天整夜打麻将，严重影响工作和党群关系。

请看下面“李金玉笔记照片”实录——

“第八，（薛坦）做官当老爷腐化堕落不搞工作长期过着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薛（坦）干了些什么，从他一天时间的安排上就得到了回答。薛一天时间的大致安排是：每天早上九十点钟才起床，起来之后进行刷牙洗脸梳头擦香脂就要半个钟头。这些事情搞完再打太极拳，然后进行早餐。饭后把文件标题看一下就进行午餐。饭后又进行午睡，又要睡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起来之后又进行再次的刷牙洗脸梳头擦香脂等，再进行晚餐。之后再东游西逛散一下步，回房就开始打麻将，一打就是（到）早上三四点钟，甚至通宵。这是（薛坦）一天的时间安排。

“为使这个问题更确切，再揭发几点：（一）薛（坦）本人有三付（幅）麻将（不包括公家的），其中有付（幅）麻将像纸烟盒那么大，这付（幅）麻将缺

两块，薛就派秘书通讯员跑遍荆州沙市武汉和十二个县才配齐。”

“（二）薛（坦）下乡都要带一个打麻将的班子便于打麻将。”

“（三）有些同志为了陪同薛打麻将，白天就要把觉睡好，晚上好陪同薛（坦）打麻将。”

“（四）有些县为了陪同薛（坦）打麻将，县委就要书记将每天陪同薛打麻将的任务，落实到人，作好准备。”

“（五）薛（坦）打麻将不分场合，在地委在机关打，到县里也打，到区里还是打，影响极坏。”

“（六）从来陪同薛打麻将都要按照薛（坦）的办法打，按薛的办法作为输赢。”

“（七）有些同志对薛（坦）的打麻将办法不懂，薛即让秘书把办法一条条地写出，交陪同者读熟。”

“（八）如秘书不在，薛（坦）就要陪同者把办法用笔记本记好，读熟再打。我的笔记本是作了记录的。”

“（九）薛最喜欢女同志陪同自己打麻将。在地直是这样，到监利更是这样。有一次薛在洪湖打麻将，医院一女护士陪同打。薛说：小李这个人很漂亮，就是手长的太粗糙。”

“（十）薛晚上打了麻将，第二天还要大肆吹嘘宣传一番，说自己打麻将有板眼，把别人的裤子都脱光了，这才洋洋得意。”

“（十一）薛（坦）在（地委）机关住有四五间房子，爱人也住有三四间房，但薛并不满足，又在第二招待所设专房，房内设备十分阔气，还有女招待员。薛整天在专房内吃喝玩乐睡，夜晚都把屎尿屙到痰盂里，还要女招待员端进端出。洗澡时也要女招待员放水，送鞋袜等。”

“（十二）、薛为把二招待所搞得自己更满意，就要各县挑选年轻漂亮未婚的女招待员送二招待所。江陵县有一次送了二个女招待员，因为年龄大些不要。以后又送了二个，却又说小孩多了又未收。为此，江陵县委书记发牢骚说：‘地委二招待所选挑女招待员比过去皇帝选妃子还要难。’”

“（十三）、薛身体并不坏，但天天吃补药。每年的补药在千元以上。薛在专区医院拿，到县医院，到区卫生所还是拿。薛拿了这多补药除吃之外，还经常送人情，特别是薛的老乡，秘书，通讯员，要单独搞个大提包，好给薛装药，走到那里把提包一（放），不亚于个卫生所。五，薛在荆州吃井水，不合自己的口味……的说……江水。为使薛喝江水，就在 1962 年开支 30 多万元从沙市到荆州 20 华里安装下水道，把江水引到荆州来……安装后薛又说只准地委专署和二招待所三个单位使用，其它机关学校居民不准使用。”

“（十四）、大肆请客。薛在 1959 年洪湖河网化会五天，请客四十多桌，每人每天基本伙食费一元，每桌再加 15 元进行加餐。薛不满足，给每桌加 20 元，还挖苦说你们没钱，我们地委出钱，每桌又加了 20 元，这样每桌共 45 元多。薛在酒席上还给京剧演员毛海泉、彭鸿玲、赵洪声、朱燕霞敬酒碰杯。北

京电影厂来洪湖拍洪湖赤卫队时，薛又请客四十多桌。薛还请中央地质部何长工，中南局邵敏和省委书记的客，这些请客款都在县委经费内报销了。”

“(十五)、薛要洪湖县委给省交通厅、省办公厅送鱼。对洪湖县委讲：省里这些负责人困难的要命。省交通厅张厅长原来 180 多斤，现在瘦的很厉害，我见了都不认识了，他够苦的了。要洪湖定期的向省交通厅、省办厅送鱼和其它食品。”（2019 年 2 月 27 日，原洪湖县石码头区区委书记，后从荆州地区洪湖管理局局长[处级]岗位退休的张文杰，传来他识别整理的李金玉 1968 年 1 月 23 日批薛坦要点手稿）

面对李金玉证据确凿的批判，薛坦在下午的“答辩会”上只得认错——

我认为把李金玉、韩耀辉、辜呈清、徐伟、马香魁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是错误的。反党集团应该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纲领，有阴谋活动的小集团组织。现在看来，三反言论是不充分的，阴谋活动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李金玉等五人错误有大有小、程度轻重、责任主次、一贯表现等均所不同，应该有所区别，牵强附会的定认为小集团，就混淆了这种区别，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具体表现。当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还由于我在思想上受了臭“修养”的严重毒害，以“驯服工具论”和“奴隶主义”思想来看待他们对待旧省委、旧地委的态度，因此把对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某些负责人的态度，错误地看成是对党的态度问题，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反映。同时，在思想方法上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未走群众路线，不是自下而上的意见，而是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错误地将李金玉等人划成一个反党集团，是我提出来的，错误应该完全由我负责，这是在洪湖四清运动中我的一大罪恶。（引自薛坦《关于确定李金玉等人为反党集团的经过情况》，1968 年 2 月 1 日）

但是，薛坦上层关系深厚，1972 年 10 月就复出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改革开放后又升任主管组织工作的湖北省委副书记，这就让李金玉在洪湖县人大代表一致选举他当县长时，突然被调离洪湖，被安排为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第 11 副处长，仅 1 个月后让他离休了。直到薛坦 1984 年 11 月 4 日病逝，李金玉才从阴影中彻底走出。

这是否寓言：在“政党专政时期”，右派永远斗不过左派？好在薛坦 1984 年 11 月 4 日死去时只有 68 岁，薛坦造冤的支持者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生于 1915 年，故于 1973 年 9 月 3 日，年仅 58 岁；薛坦的后台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生于 1917 年，死于 1992 年 3 月 16 日，享年 75 岁。三个造冤者平均寿命只有 67 岁！而“洪湖反党集团”的“领军”李金玉病逝于 2002 年 10 月 8 日，享年 80 岁；“洪湖反党集团”的“硬骨头”辜呈清，病故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享年 84 岁；“洪湖反党集团”的“寿星”韩耀辉，辞世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年满 90！还有 82 岁的“上海工人”徐伟和 80 岁的“老公安”马香魁皆逝于 2009 年。“洪湖反党集团”五个“蒙冤县令”，虽然身心倍受摧残，却都长寿在 80 岁以上，平均 83 岁！相比

之下，薛坦、张体学、王任重三个造冤者平均寿命只有 67 岁！无一人活到 80 岁！

这又似乎寓言：为民吃苦的“右派”总比作威作福的极左活得长！更有百姓永远感恩“右派”而痛恨“左派”——当年权势熏天的薛坦，如今在网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李金玉、韩耀辉、辜呈清等，却频频出现于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剧本之中，《洪湖有个李金玉》、《县委书记李金玉》、《世间已无李金玉》、《水城》、《李金玉年谱》，成为网红，上了凤凰卫视！而今又进入“中国右派名录”（《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洪湖县委的“消极反右”寓言警示：习惯于强制他人的“左派”、“上级”，应当明白，人类思想史上有三个最须牢记的核心概念——“自由”、“共生”、“个人主义”。你的“专制自由”必须遵从“人须与人共生”的“共生主义”前提，必须顾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个人主义”，守住“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的共生底线，按照“百花齐放”的天道实行“阴阳并生”——左右共存。

这正是：留得“右派”英名在，百家争鸣共生福！

谨以此 8.7 万多字的长序献给千万字巨著《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朱健国

2019 年 2 月 27 日

于深圳早叫庐

电话：13902918149

〔本名朱建国，1952 年出生，杂文家、主任记者、“伪现代化”研究者；198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 年自动脱党；1988 年起，先后任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评论科长、“广播漫谈”主编、《南方人才市场报》副总编，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深圳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大公报、大周刊》主笔兼新闻部主任、《中国市场》（新华社香港分社）专刊部主任。〕